觀察

逢星期六出版　三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每份售四千元

第三卷　第七期　再版

INDEPENDENT NON PARTY · THE OBSERVER

專論

我亦追論憲政兼及文化的診斷　張東蓀

釋「左」與「右」　嚴仁賡

論現行的留學政策　季美林

外論選譯

中國的對美政策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長城綫內外的爭奪（觀察專稿）　觀察記者

觀察通信

劉伯承南下記　觀察讀者投寄

夾在鋸齒間的皖中　觀察讀者投寄

北平學生被捕被釋記（北平通信）　觀察特約記者

文藝

令人醉的詩和令人醒的詩　何達

書評

國家與道德　吳恩裕

讀者投書

西北民生實業公司迪化分公司經理被捕

黨務機關併吞敵偽產業又一例

宋子文捐款動機

香港看大選

蚌埠緊張

擋不住・國不攏・共不起

觀察文摘

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　胡適

建議大學裏添設「時事研究」一科　嚴仁賡

觀察漫畫

撰稿人

卞之琳　王迅中　伍啓元　呂復　沈有乾　吳恩裕　李純青　李廣田　周子亞　宗白華　胡適　柳無忌　孫克寬　高覺敷　許德珩　陳友松　陳瘦竹　夏炎德　梁實秋　張沅長　張東蓀　笪移今　郭有守　馮至　程希孟　傅雷　費孝通　楊繹　楊西孟　雷海宗　趙超構　蔡維藩　樓邦彥　錢清廉　錢端升　鮑覺民　戴世光　韓德培　蕭公權

王芸生　王贛愚　任鴻儁　何永佶　吳世昌　吳澤霖　李浩培　沙學浚　周東郊　季羨林　胡先驌　徐盈　馬寅初　許君遠　陳之邁　陳衡哲　陳維稷　曹禺　張印堂　張忠紱　張德昌　黃正銘　章靳以　馮友蘭　曾昭掄　傅斯年　楊剛　楊人楩　葉公超　趙家璧　潘光旦　劉大杰　錢能欣　錢歌川　錢鍾書　戴文賓　戴鎦齡　龐乾　顧翊羣

讀者投書

讀者對于讀者投書的意見

編者先生：貴刊讀者投書最好限於新聞報導性或有具體建議的文字，說幾句俏皮話的短文，既不莊嚴，又不夠幽默，最好不載。

劉澄　九月廿七日　上海

西北民生實業公司迪化分公司經理被捕

編者先生：新疆問題是外交、民族、政治三個因素的交織而成的。除外交問題恆久不變外，其他兩個因素的比重，每因時而異。伊犁事變以前，民族的仇恨，顯然是問題的重要因素，伊犁方面也就揀擇了這個題目，作為革命的口號，他們勝利了。伊犁事變以後，在民族平等與民主政治的兩大原則之下，民族問題顯然再不重要了，繼之而起的，似乎仍是政治廉明與否的因素了。

魏德邁批評中國現政治是無能與貪污，當然新疆也不能例外。當地人士參加省政後，由於他們缺乏行政經驗與政治修養，不見得比過去的漢人政治好些；而部份保存的漢族官吏，經過一年來在張治中將軍「除三害」（嚴禁貪污、賭博、鴉片）的口號之下，雖然比以前進步多了，但不幸還免不了有少數敗類在混水摸魚。反正天高皇帝遠；人民的監視與輿論的力量，是那樣薄弱無力！伊犁人物很聰明的看出了這個破綻，最近改變了他們的政策，由「民族革命」轉為「政治革命」了。從最近伊犁出版的漢文「民主報」的言論以及在瑪納斯西來的車輛中所發現的宣傳品裏，他們喊出了這個口號。說：今天的新疆，已不是民族問題而是政治問題了。無論新疆那一族的同胞，都是在黑暗腐化的現政治下過日子，我們應該團結起來，改革現政治。

新疆問題的危機所在以及伊犁方面的改變政策，似乎若合拍節，下面就是一個最現實的例證。那就是西北民生實業公司迪化分公司經理周崇勳貪污被押所引起的種種反響。緣新疆本有一「貿易公司」，張治中主新，鑒于該公司的與民爭利貪污違法，特改組為「企業公司」，旋以人民反對，經省府會議否決取消。張氏為便利新疆與內地之運銷供應起見，不得已於今年元月間另組「西北民生實業公司」，設分公司於迪化以代替企業公司。當時分公司經理人選，頗費考慮，有主張用維族人者，亦有主張用內地漢人者，結果卒以在新疆從政多年的東北人周崇勳在省府秘書長列孟純的力薦下，出任該職。按該周崇勳曾任盛世才親蘇時代之財政廳副廳長，為人世故，前年充任迪化合作社經理，尅扣民食，供應麵粉例摻雜糧十分之二，市民切齒。此次復利用職權，在購銷新疆特產——和闐地毯之名義下，套用公款，直接圖利，已有證據者達一億五千萬元之鉅。事為該公司會計方面所悉，即予檢舉，當即專案簽報張治中將軍，適張氏正陪鈕永建遊天池，幾度簽呈，均無批覆。後由其侍從參謀張立鈞遙呈而上達，張氏極為震怒，手令新疆警備總部軍法處嚴辦。該部於八月廿五日晚以汽車接至東花園，此一貪污巨人遂鋃鐺入獄。消息傳出，市民莫不額手稱慶，深盼早日判處極刑。惟據關係方面探悉，該犯雖在囹圄，然活動能力仍強，與同押犯人言談自如，且張治中主任月初赴京，而此案內情又極複雜，幾時判決，尚難逆料云。據悉：該案發生之初，曾以巨款賄賂行轅承辦該案之某職員，該職員答稱：此事有關漢人聲譽，有損國家體面，決秉公辦理。且過去內地報紙輒多新漢人貪污不法之報導，以為來新疆工作者，均係亡命不良之徒。此一觀點，深為此間優秀清廉而有志服務邊疆之工作同志所痛憤。為改正歪曲視聽起見，亦應將該案明白辦理云。

陳ＸＸ　九月二十八日　迪化

黨務機關併吞敵偽產業又一例

編者先生：平津區鐵路管理局接收的天津張自忠路八十四號倉庫一所，八七、八八兩號存貨棧一所、八九號小倉庫一所、九十號公事房五間、八八號存貨棧所存架貨木四千根、運貨小鐵車三十餘輛，跳板三十塊、及所有門前碼頭各項房屋，據國民黨　津區鐵路特別黨部執行委員會函該局，以奉中央財務委員會六、十三，京（三六）務貳字第九八五函准國防部秘書廳組字第七一二一〇函通知，又奉末眞京（三六）務貳字第一四九五代電准行政院本年七月廿四日會三字第二九二一〇號公函：上項倉庫碼頭車輛等均已分別通知河北平津區敵偽產業處理局照數移交轉帳。以國防部行政院兩項大帽子來壓迫平津路局移交轉賬，這是很巧妙的手法，但不知鐵路特別黨部是否兼營客貨儲運業務？或乾脆把國家財產據為黨有呢？

一個公務員　十月二日

宋子文捐款動機

編輯先生：貴刊三卷四期讀者投書中，楊不平先生曾就宋子文獻產事發表了意見，對宋氏祇着眼於國民黨殉難黨員家眷之救濟而忽視了一般非國民黨黨員殉難者的家眷一點，表示遺憾，楊先生的意見是很對的。不過宋氏此次獻產之動機，根本不是為了救濟那些在水深火熱中的同胞，而是企圖和緩其黨人對他的攻擊。并望能因此而獲得他們的諒解與支持，事實，宋氏這種希望是達到了，當他獻產救濟因抗戰及剿匪而犧牲的黨員的家屬的消息傳出後，曾經激昂一時的「清算豪門資本」的呼聲便頓時銷沉下來，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喝采之聲，跟着宋氏被委任為粵省府主席的命令也發表了。

老百姓的死活問題，當局是就不大放在心上的，所以豪門權貴受到自己人的壓迫時，祇須掏掏腰包，分惠一點給自己人就行了。可憐的還是那些聽到「清算豪門資本」的呼聲便深為興奮的人民！

梁子奇　九月廿六日　香港

香港看大選

編輯先生：本月廿日香港工商日報刊了一篇「粵穗選舉縱橫談」，報導廣東在選舉國大代表及立委的前夕的各種形相。該文除了說及一般市民對此次大選「不感興趣」之外，更揭出關於選舉的「眞正程序和手續」，「不特選民不明白，即參加競選的有時也不知所措」。因之「弄得人們目眩頭暈」。同時對於可能發生「包辦選舉」各種舞弊的情事，雖為當局所注意，「但是直至現在為止，各縣的人民十之六七還未取得公民資格，叫他們怎樣去選舉呢？何況一般鄉民，那個眞的懂得選舉投票這回事；另一方面，官僚政客，地方豪紳，紛紛作競選之活動，縱橫捭闔，「勾心鬥角」！大家相見了必詢問「：你花了多少錢？你準備花費若干？」」

從上面的種種事實看來，我們不難想像到將來大選的「佳期」到來之日，十一年前這種巧取豪奪，包辦賄賂的選舉「好戲」，將再一次出現於世人面前！

梁子奇　九月十二日　香港

（下接二十頁）

發行者　觀察週刊社
社址：上海（5）吳淞路四四〇弄十一號
電話：四三八八二

國內訂閱

	三個月十二期	六個月廿四期
平寄	四萬元	八萬元
掛號	五萬元	十萬元
航平	五萬元	十萬元
航掛	六萬元	十二萬元

如郵資漲價，請補繳

國外：全年美金五元（平寄）

觀察華北航空版
代理發行所：北平新寰書店
北平王府井霞公府甲一號

儲安平主編

觀察

第三卷　第七期

三十六年十月十一日

本期作者

張東蓀：燕京大學教授
嚴仁賡：浙江大學教授
季羨林：北京大學東方語文學系主任
何　達：清華大學學生
吳恩裕：北京大學教授

我亦追論憲政兼及文化的診斷

張東蓀

在觀察三卷四期五期上有梁漱溟先生的「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文中且引我爲同調，我看了以後，深感共鳴。他所提出的問題亦正是我久已蓄在心中的問題。這一些成爲問題在我心中已將近二十多年了，不過想來想去總得不着一個最滿意的解答。近年以來，自己的思想稍稍成爲一個系統，於是對於這些問題乃自然而然遂有了一種看法。我這個看法與梁先生或許不完全相同，但在動機上却是一樣的。

梁先生的結論似乎是中國不能走上英美式憲政之路，因而亦就不必勉强去走。他所以在政協開會時對於憲法的修改最不感興趣。不過當時我亦是一個對憲法不感興趣的人。我早明白歷史決不會因一紙憲法而翻身，憲法的討論近於白廢光陰。但我却另有一個觀點。可以說我們二人態度同而解釋不全同。毋寧說我對他的態度是十分同情的。所以在本文決不是把他所主張的中國無法學英美一層加以否認。

關於「預告選災」，簡直可以說選舉已經成災，無待預告。現在各省市的參議會選舉，不但笑話百出，並且是對於中華民族一個大侮辱。但這些不是本文所要論的故請從略。本文只討論今後能不能有眞正的選舉，和萬一永遠不能有眞正的選舉，是不是中國即無法實行民主政治。這兩個問題恐怕都是梁先生那篇文章中應有的涵義。我以爲中國今天以後是不是絕對不會有眞正的選舉，據現在的情形尙不易遽爾輕下斷語。不過據今天情形來說，則可十二分肯定選舉是無法辦的。如果情形變了，便就難說。所以離開了目前的情形而專作抽象的議論，主張中國永遠無法辦選舉，我個人始終以爲近於速斷。凡是一個主張在證據沒有充分以前毋寧以保留爲上。因此我對於這一點不加以討論：即我旣不說中國將來絕對能辦選舉，亦不說將來絕對不能有眞正的選舉。我在此只揭穿一點，希望梁先生注意。我亦知梁先生，或已早注意到此。然仍不妨特別强調指出，以便喚起大家的注意。這一點就是：自民國成立以來所有的選舉都是爲特殊勢力所利用。辛亥到現在不過三十餘年；凡五六十歲以上的人都會知道這段歷史。我個人更是直接間接，多多少少，耳聞目見，知之較詳。可以說在民國初年的選舉雖亦未必眞代表選民，然而確是不由金錢買得。

這個緣故亦很簡單：就是因爲那個特殊勢力還沒有想到利用選舉。等到那個特殊勢力下了決心要利用選舉了，則選舉的清白便無由倖免。除了民國初年還沒有發見選舉是一個大可利用的東西以外，此後就從來沒有一次眞正的選舉。所以我的觀點毋寧近於常識：即中國的選舉，所以不能辦就是因爲有特殊勢力想來利用。如果說一句假定話，即假定萬一將來沒有特殊勢力了，試問選舉還是無法辦麼？我以爲我們必須承認撤除了特殊勢力，選舉還是不能辦，在事實上沒有充分證據。旣無充分證據即不妨懸而不斷。所以今天很明顯擺在我們面前的事實只是選舉之無法辦由於有特殊勢力在那裏利用。

以上所說雖是千眞萬確的事實，但觀點是常識，或許梁先生看了未必過癮。但我並不是以爲這樣立論便可將其與文化的關係斬斷。我亦正和梁先生一樣，主張這個問題是與中國文化有關。不過我不主張選舉的無法辦是直接與中國文化的特

性有關。我的着眼點反而在於何以中國會有利用選舉的特殊勢力。這個勢力的產生是與中國文化的特性有關。所以論到選舉與文化的關係，我毋寧是取間接的。

於是我們要論到文化方面。中國文化有其特性，這個論點我完全接受。同時我們亦都知道選舉是一個西洋的制度，換言之，即是舶來品。但若說這一個舶來品來到中國以後遂把中國文化上的優良方面冲毀了，則我願舉出其他舶來品爲證。例如飛機，除了在抗戰期中盡了其正面的功能以外，其在中國反足以助成同胞間的自相殘殺，認爲害多於利，並無不可。遠一些的如鐵路，鐵路所到之地即是外國貨物傾銷所及之場，農村彫敝，資本集中，富者愈富，貧者愈貧。姑舉二例，其他還是甚多，不必枚舉。總之，外來的東西，不論是制度抑是器具，到了中國來以後，總是害多利少，初不限於選舉一事爲然。

關於這個情形我却有一個解釋。最近大公報專欄上有費孝通一篇「行政基層的僵化」的文章，其中有一點頗得我心。他認爲中國政治軌道有兩個，一是自上而下的；另一是自下而上的。雖然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等用語容易導人於誤解，但事實上却確有這樣兩概的分別。所以我特別避用這些容易誤會的名詞，而只把上一概名爲甲概，把下一概名爲乙概。甲概是皇帝的政權與官僚的政治。乙概是鄉民爲了地方公益而自己實行的互助。這種互助並不是完全政治性的，乃同時包含宗教、家族、慈善，等方面，就中尤以社會方面爲多，例如調解爭執與保證契約以及守望相助等等。這一概正是社會學家所稱的 Community。我與費先生意見稍稍不同的地方卽在於我不把他認爲是行政基層。這只是人民在集體行爲上的自發性互助。社會學家往往把合羣認爲是人之天性，倘用附會的話，可說是對於孟子性善論加一註脚。據我揣測，似乎梁先生所宣揚的中國文化就只指這一方面。梁先生看見這一方面的優點，我是可以同意的。

不過梁先生却忽略了中國還有一方面，卽我在上文所述的那個甲概。假定我們把社會學亦認爲是一個實證科學而不參加價值判斷在內，則我們可以說任何社會上的機構都是由於當時有那樣需要。「需要」一名詞是功能派社會學所提出，但我在未曾讀過他們的書以前却已早想到。他們分需要爲二大類：一是基本需要（卽生物性需要）；一是孳生的需要。我却以爲在孳生的需要中還要分二次的，三次的等等。例如補偏救弊，乃是因爲有了偏，有了弊，然後才有補救的需要。但有時因補偏而反產生相反的偏，因救弊又致有不同的弊；於是又要加以補救。社會制度上種種變更往往是由於有這樣的情形。準此而言，甲概的皇帝政權實出於統一的需要。自封建解體以後，諸候互相征伐，在需要上自然而然趨於要求有一個統一的皇帝來征服或消滅那一些割據的土皇帝。因爲人民對於土皇帝的受不了實甚於全國性的皇帝。全國性皇帝所以成功，一半固然是由於有個統一的需要，另一半則是由於費孝通所說的那個無爲哲學的政治思想之被採用。秦雖做成統一，但却未採取無爲主義的思想，所以不能維持長久。漢朝繼之，二者兼有遂能統治數百年。後世儒家無不兼採道家，其主要之點就在於想用種種方法希望在甲概下仍保留乙概，不使甲概完全把乙概吞沒了。在這一點上我認爲中國傳統的政治思想都是旨在保護乙概。就中尤以道家儒家爲最。除了商鞅等走相反的道路以外，其餘都不發生重大的影響。從這樣的一個觀點來說我始終認爲儒家在歷史上可說盡了他的使命，詳言之，卽他們總是想在甲概吞併乙概的壓迫過程中設法抵抗之。因爲甲概的皇帝政權在當時有其需要，所以在那個時期沒有主張把他廢除。我們論歷史上東西必須重視其時代性；此卽是所謂需要之時間性，在某一時代有其需要的到了次一時代就會消失了。若就次一時期的不需要而推論其前的一時期，以爲亦無需要，這是犯了錯誤的。中國古人（先儒）沒有人主張把皇帝廢除。這決不證明他們是爲帝王張目。因此，我對於儒家的看法和現在時流論客很不相同。我以爲儒家在歷史上說得好些是功多於罪，說得壞些亦只是功罪參半，而斷不可認爲完全是罪人。這一番話似乎太偏於政治思想方面了，我們還得就實際方面來說。須知甲概的造成並不是由於政治思想。政治思想只是對於已經存在的實際情形想有所矯正與改善而已。關於實際方面我又有一個較詳的說明。

我在拙作「理性與民主」一書中把人類文明分爲三個大段落。第三個段落現尚不可知，故不討論。從有歷史起，我列爲第二期。歷史以前，則爲第一期。第二期的特徵是國家之產生。關於這一點我最服膺德人Franz Oppenheimer（見所著 The State, translated by J. M. Gitterman）之說。此說經馬克斯倡之於前，社會學者如奧氏等人繼之於後。其詳在拙著中已敍述了，現在不必多贅。總之，第二期文化的開始是由於一個羣把另一個羣壓倒了，佔領其土地，奴役其人民。於是在政治方面有「政府」出現；在社會方面有「階級」出現；在經濟方面有分工出現。由一個羣到另一個羣乃是移住；把另一個羣壓倒則是戰爭。所以戰爭，移民政府（卽統治關係），與分工乃是一回事。在這個以前却無此現象。人民渾渾噩噩，熙熙融融，過那種雞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的生活。社會學者不論贊成馬克斯主義與否大多數皆承認有原始共產。我却更願于原始共產之外同時再添上一個原始民主。人類學大家馬林諾斯基（B. Malinowski）于其近著「自由與文明」（Freedom and Civilization 1944）上

亦提及原始民主(proto-democracy)。可見原始民主亦非我一人之私言，我遂把這種原始共產與原始民主認爲是一期文化的內容。關于這些在此短文中無法詳論，讀者還請參考拙書爲盼。在此只說一點：即東方與西方之不同，即中國與西洋之不同，或許就在于中國特別保留第一期文明較多。所謂乙概正就是第一期文明的殘留。

在此又要特別提出的是中西不同亦未嘗不出現于甲概方面。即中國自走入第二期文明以後，其本身始終未起重大的變化，而西方則不然。西方從未辦過眞正的統一。于是變化後變化，乃變出所謂「民族國家」(national state)來了。而中國却自始即永遠滯留在「天下式國家」(此何永佶先生的創語，却是很好)中。須知把國家變爲民族國家却是把國家的原有的害處減削了不少。把政府的性質亦變化了。政府本來是剝削階級的獨占機關，借維持治安之名，施行强制力，以保其特殊利益。遞變爲民族國家以後，政府由人民組織成，便加上了爲人民謀福利的功用。所以西方的民族國家與民主政治乃是一件事。中國既沒有變化到這樣情形(或階段)，則中國的政府不論其名稱如何，其性質總是那變樣子的。所以在西方到了今天可以說已無甲概與乙概之分。又可以說，甲概把乙概吞沒了，在西方毫無痛苦。用不着有人起來想法子去抵抗這個趨勢。反之，政府既能代表人民則政府管的了多不會是壞事。在西方政治思想下只有十八世紀初一些自由主義者主張政府愈少干涉人民愈好。後來就不聽見這種論調了。這個情形和各國對于君主的革命與民主政體的確立是成比例的。中國不然：雖則辛亥以來三十多年，但始終沒有把政府的本質從根本上改變了。如果有人來提十八世紀的歐洲思想，而中國人却又以爲過時了。這豈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麽？總之，在今天的西方，乙概已無保留的必要，任憑甲概把他吞併了，只有簡單徑捷爽快。中國正相反，人民所以能喘一口氣乃是賴有乙概當存。如果讓甲概把他們吞沒了，則所有中國固有文化的優良方面便都隨之俱盡。

在這種情形下，最矛盾的是中國與西方文化相遇的時候。中國情狀如此；西方情狀如彼；二者相遇，則中國沒有不吃虧的。其故乃由于所以西方的東西入來無不是到了甲概爲止。乙概本來是自足的，用不着吸收外來文化。外來文化一到甲概無不是助桀爲虐。民族國家的政府其權是小不得的；天下式國家的政府其權是大不得的。不幸有一個世界結構的所謂聯合國，却必須把二者比肩而立。試問這如何得了？讀者如不信，讓我把舶來品助長中國政治作惡的事實列舉出來。最顯着的如警察制度，亦是學外國，只有對老百姓施壓力，而在無警察的鄉間治安並不成大問題。至于由此進一步變爲特務，更是法西斯蒂的玩藝兒，害人更多。又如統制經濟，在外國不失爲一個好辦法，一到中國即變爲萬惡之源了。此外，我在上文所舉的飛機與鐵路亦就都是好例。梁先生看到西方的東西無不破壞中國固有的文明，我很佩服他的炯眼。我想梁先生若肯舉例必是較我更爲詳盡與親切。我今在此短文中只强調一點：即西方文明的入來所以成爲橘過淮爲枳的緣故只是由于西方的東西助長了甲概，用以破壞乙概。中國本身却沒有這樣需要。相反地，可以說中國本身不但有保留乙概的需要，並且更有限制甲概的需要。無如中國同時又必須參加于世界各國之林。好像一個人體溫甚高，他需要穿薄的衣服；其他諸人身溫甚低，都需穿厚的衣服，而却在一個大宴會中又必須穿一樣的衣服，這就難辦了！西方學者很明白政府是一個不可缺少的「惡」。中國這樣的皇帝政權更是惡之中的更惡者。外來文明無不加重其惡。所以有人咀咒西方文化，這不是完全無因的。

但在閉關時代，這個問題還比較好辦。即專制政權如果虐民到了極高度的時候，人民挺而走險，便起而造反，遂把這個太壞的政府推倒了。所以中國歷史上常常有換朝代，就是由于這個緣故。現在把換朝代美其名曰革命。其實二者只是一個東西。我常說革命是中國的土產，屢見不鮮，毫無神聖可言。並且我以爲中國三千來亦就是因爲換朝代太多了，以致把政權視爲「大寶」，既得者千方百計想維持不墜，未得者拚命去奪。遂把道德，文化、經濟、都搞得受了很大的惡影響。外來的文明參加進來以後反把政府的惡加强加重，以致反抗更爲不易。此所以中國接收外來文化只見有壞的方面。即以今天的國民黨政權而論，有人說是中國自有歷史以來最壞的政府，則論理應該容易被推翻，然而不然。這便是由于有外來的種種關係足以使其維持。

以上是說明何以中國與西洋文明相遇即會演成壞的現象而較好的現象爲多。我們更須說明一個制度之在一個民族即等于一件衣服之在一個人的身上一樣，必須大小合身，長短適體，尤能滿足當時禦寒的實際需要。倘使一個短小身體的人而穿了一件長大的衣服；倘使在夏天而穿皮衣，這都是不合宜的。一個民族而硬要學另一個民族的制度文化習俗亦會有這樣的情形。所以我認爲一個制度無論是從外國搬運來的與否，而欲其生根，則必須自自然然。凡土着的必是由根裏生出來的，我在拙書中主張迎接外國文明必須從本國文明中的相似點入手，就是想生根必須用接根之法。再淺言之，所謂生根亦就是看其有無此需要。一個人正寒時，有人拿一件絨衣給他，他必定立刻穿上。假使在夏天，雖勉强教他穿一穿，他必不久仍自脫了。即以選舉而言，假如一班老百姓不感到其需要，敢說永遠不會變爲眞正的東西。今天國民黨所辦的國大選舉也好，各

省參議會選舉也好，都是國民黨有這個需要，而人民無之。所以人民不感興趣，以不參加為抗議的表示。這就是我在上文所說的那個特殊勢力的利用。至于如何方能把人民亦使其對于選舉感到有需要，則必須如西方的民族國家一樣，乃是一個整個的問題，牽涉到各方面，例如政府本質的根本改變，經濟狀態的走入新軌，教育的初步普遍，政黨的改換作風，軍隊的絕對不干政，等等。這便不是本文所能討論的了，必須另文為之。

我的意見不妨再歸納總結來說，則是如下。論中國文化不當專就其某一方面來講，而應從其為一個複雜的全體來看。中國自歷史以來，唐虞三代太遙遠了，姑且不論，此後從來沒有一個好政府，即人民的政府，與全體人民意志希望相合一的政府，我想這一句話決不是厚誣。所以現在的壞政府亦只是順着歷史的舊路，更加許多外國的新花樣與新方法以致更壞，壞到最高度而已。以與歷史上的政府相較，只是程度差等，並非性質異同。何以中國數千年來沒有把政府改好，何以壞政府會如此層出不窮，這便不能不求其原因于文化。我在上文提出甲乙兩概之說，如不取實證的觀點，則可說甲概完全是壞的。這便是天下式國家與西方的民族國家之不同了。民族國家把甲乙兩概打成一片，成為一個一元的。凡民族國家所有的制度與辦法若搬運到天下式國家來，除了助長天下式國家的政府的權力，使其對人民更高壓更榨取以外，沒有別的，亦不會有別的。所以外來的東西，如選舉制度，警察制度，統制經濟的辦法，以及飛機鐵路等，本來是中性的，無所謂好壞，而毛病還是出于中國本身。這誠如梁先生所說，是患的嚴重文化失調症。就中尤以「政府病」為其主要症候。好像一個人雖遍身有病，而尤以胃病為最，因為一切滋養品必須從胃入而消化之。胃一有病即致全身陷于疲弱，耳聾眼花都起于營養不足。

本文可以說是從我的觀點來補充梁先生所提的問題。讀者千萬不要以為我反對梁先生所說，我不但無所反對，並且深感到他所提出的問題之重要性。這個問題久為國人所忽略，所以他一提出即不啻抓着我的癢處，使我說了這一大些的話。希望有同感的人和梁先生再加以教正。

（十月一日寫）

釋「左」與「右」

嚴仁賡

一

左，右，左傾右傾，向左向右，左翼右翼，左派右派，……這一串名詞，任憑您翻開一張當天報紙，一份時事雜誌，或是一本政治經濟的期刊，隨處觸目的皆是。茶餘酒後聊聊天，人前背後議論議論國家大事世界大勢，這許多名詞也能隨地隨時有意無意的迸出人口。然而究竟「左」為何義，「右」何所指，認真的問起人來，却又言人人殊。我想名詞中，人之不求甚解，不加思索，遂即貿然脫口，率爾落筆，揉雜着主觀的感情的成分，任憑着一已的意氣去使用解釋或曲解，恐怕沒有再比「左」和「右」為甚的了。

事實上這古怪現象却也不限中國。我們翻讀國外的報章雜誌，諦聆人家的批評議論，可以發見混亂的情形不比我們清楚多少。甚至在一種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之下，和在另外一種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之下，可能還有參差以至全然相反的解釋。

二

在中國一般人的觀念中，對於「左」和「右」有以下幾種不同的看法：

有一種人，認為「右」派就是正人君子和循軌蹈矩的一些人物。於是把左派便比作洪水猛獸的思想，和殺人越貨窮兇極惡的暴徒。提起左派，可以嚇得語聲發顫；提起左派，也可以作出咬牙切齒得之而後甘的神情。「右」與「左」在他們眼中，不過是「善」與「惡」的變名而已。這些人充分中了宣傳的流毒。

另外有一種人，却認為左就是共產黨，右就是國民黨。於是乎，偏共產黨的人如民主同盟一類的人物自然是偏左的；偏國民黨的人如民青兩黨一類的人物自然是偏右的；公正的，不偏不倚的人物因而是不左也不右的。在國內，對左右作如是觀者，相信佔絕大多數。即如「觀察」編者徵詢讀者對其所持態度的意見時，便也毫無遲疑的把他的徵詢對象，全部放在這第二種人裏面。

第三種看法，認為左是民主國家，或多黨政治，或是政權寄在多數人手裏的政體；右是獨裁的，極權的，或一黨專政的政府。與此平行的另一種看法，認為左是共產主義和實行共產主義的國家，右是資本主義和實行資本主義的國

衆，社會主義和實行社會主義的國家介乎其間，不左不右。

第五種解釋認爲右是一批滿意現狀並且想維持現狀的人，而左則是一批不滿現狀而欲打破現狀的人。近於此的第六種解釋則認爲政治上一切緩和的，保守的，或反動的思想或行動是右的，一切前進的，激燥的是左的。

不幸上舉常人對於左和右的幾個認識和瞭解，不是僅只抓到左和右的一條腿，就是僅只抓住左和右的一隻臂，沒有一個瞭解能夠概括全體的意義，能夠解釋一切的現象，全都是偏狹，籠統，甚至於武斷。因爲左和右並不能僅以某主義某政黨作爲代表。關於第一個解釋，我已說過受了宣傳的流毒，用不着駁它，因爲理論和事實，全講不通。可是這毒中得眞也不輕，而且數十年如一日，至今還在爲人不停的灌輸。第二個解釋流行最廣，但也是牽強附會的。因爲雖說國民黨的政策絕對的右傾，但是國民黨的政綱尙是相當的左；同時，共產黨的行徑並非盡左，有時且極右，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實。中間政黨，只有模稜兩可的政綱，專以斡旋爲能事，政策之有所偏，只好說它偏共或偏國，不好說它偏左或偏右。並且左和右還只是主觀見解或者行動的兩個方向，沒有道義觀念存在其間，所以觀點容或不左不右至多可說是中立的，無所謂公平或否。

名民主國家爲左，極權國家爲右，或名共產主義國家爲左，資本主義國家爲右，有一部分的眞理。然而如美國這民主國家，却正有不少的人駡她右駡她反動；而蘇聯這個極權的國家，人們偏又說她是左。同樣，資本主義國家的許設施誠然是右的，但是我們能說在資本主義國家實行的高度的累進課稅和一切的福利設施也是右的嗎？很多人批評美國的共和黨人爲右派，爲反動份子。而這些共和黨人却又喜歡駡希特勒、墨索里尼、駡佛郎哥、駡二陳爲右，爲反動。眞假難辨，誰是誰非，簡直摸不清頭腦。總之，左和右是很難拿表面的某種政治制度或某種經濟制度作爲代表的。

欲保持現狀之爲右，欲打破現狀之爲左，若以今日歐陸若干國家的情形，以目今東南亞洲若干殖民地國家的情形，或以中國的現狀而論，誠然不錯。大體上，在位者或統治者都想維持現狀，一律向右；在野者或被統治者都想打破現狀，一律向左。不過這解釋也還不能概括一切。例如在位的英國工黨政策反而向左，在野的英國保守黨政策反而向右。又如美國自羅斯福死後，杜魯門把老羅手下一批「新政」者（New Dealers）一個個排擠下去，政策倒轉頭來往保守上走。這雖是他不滿於現狀而欲改換現狀，然而批評他的人說他向右，沒有人說他向左。這趨勢，去冬共和黨抓到議會之後，更爲明顯。他們處處想打破現狀，掃除「新政」，這更不是向左，是大大的右，是走的回頭路。

第六種看法在多數的場合之下確是可以應用。準此原則而言，則認英國的保守黨爲右，英國的工黨共黨爲左；認美國的共和黨爲右，美國的民主黨略左；或是認中國的國民黨爲右，中國的共產黨爲左，都不能算錯。不過，甚麼叫做保守？怎樣才可稱爲前進？用甚麼標準或原則可以測度衡量？都還是一些沒有答案的題目。

這六項解釋還有兩個共同的缺點：其一，左和右不僅可以解釋一國的對內政策，同時它一樣可以用來解釋一國的對外政策；其二，左和右不僅可以解釋政策，同時它一樣可以解釋思想。

最古怪，儘管六個解釋沒有一個可認爲洽當，可令我們放心應用，倒是人人竟也毫不在意不加思索的隨便使用；儘管人人毫不在意不加思索的隨便使用，竟也沒有幾個人認眞的問過自己或旁人，倒底左與右的眞義何在。

三

丟開以上的六種解釋，我來另外替左右兩詞找出一種新的釋義和新的解釋原則。這新的釋義和解釋的原則，三言兩語說不淸楚，甚麼主義或甚麼政黨名稱也不能代表，是些囉嗦的說明。不過我却希望這新的釋義和原則，能夠概括的說明一切社會現象；希望這新的釋義和原則，可以用來分析當前或任何時代的政治的或經濟的政策，而不流於偏頗或籠統。以下我分開：一政治的，二經濟的，三對內的，四對外的，一共四項，作爲評判一事左右的幾項原則：

甲、政治的對內政策

一個政府和它所行的政策，如果承認政治上人人平等，承認人人得以過問政治，批評政治，參加政治，能夠尊重所有的人的意見，能夠尊重每個人的基本權利，這個樣的政府和它行的政策，我們稱它是左向的。反過來說，一個政府和它所行的政策，把政治視爲少數個人少數民族或一個階層一個黨派的專利，不顧民意，一意孤行，抹殺人民在政治上的權利，這個樣的政府和它行的政策，我們稱其向右。一種思想，它鼓吹政治大衆化，開明化，否認階級權益，打破地域和種族的偏見，這種思想是政治的左派思想；這種思想見之於行動，就又是左向的運動。相反的，一種思想或運動，認爲政治乃少數人之事，以爲人皆愚我獨智，所以國家應由我來管，或是鼓吹鼓動階級利益，一黨一派利益、某一種族某一地方的利益，所以役人而不欲役於人，這種思想或行動又全都是右向的。

用以上這命義，似乎無意間已把左比爲民主政體，把右比爲獨裁政體，却

又不然。因民主政體中仍有右，專制政體也可有左，而且政制和年代並不能拘束它的使用範圍。

乙、政治的對外政策

一個國家和她所行的政策，如果把自己和世上所有國家能夠同擺在一條水平上，一視同仁，均等機會，破除大小强弱和自尊自卑的觀念，許身於增進全世界各個國家各個民族的幸福，合作共濟，促進全人類的文明進步；在國際之間更肯仗義執言，打抱不平。一國的政府如此，我們稱她爲左傾的政府，一國人民具此觀念，我們稱她的人民左傾。思想如此，是思想的左傾，行動如此，是行動的向左。反之，一個國家的政策，或者她的人民的觀念或思想，偏向於只顧本身的利益，不顧他國利益，甚而至於恃强凌弱，卑侮文化國力不如己的國家，或爲强劃地域，造成對峙局面，以便操縱世界政治，行霸道不講王道，到處利己損人。類此的政策思想以至行動，統統屬於右的下面。

依着這個解釋，則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一部分的國家主義，民族自決運動，世界主義，國際主義，大同主義，「天下一家」的思想，烏託邦的幻想，世界語運動，以及近年倡行的世界公民運動(World Citizenship Movement)，都可說是左傾的。帝國主義，老牌的殖民地政策，國際强權政治，均衡主義，以至國際孤立主義，都可說是右傾的。過去的國際聯盟，目今的聯合國組織，雖仍不脫强權政治的意味和色彩，也還認爲傾左。

丙、經濟的對內政策

從經濟一方面說，某一政府存心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注意到社會上每個階層的福利，令全國人民的財富和所得一致提高，使人人平均享受生產的果實，用以提高教育的水準，提高消費的質和量，它以消除鉅富赤貧，防止人與人間的榨取剝削爲己任，不讓壟斷掠取現象的存在，這都是由上而下的傾左。如果有些人的思想或行動，注重互利互助(卽西人所謂的 mutual advantage and mutual help)，注重共存共榮，提倡或促進經濟機會之均等，矯正財富所得之不公。這又都是由下而上的傾左。

反之，在位者只替少數人一個階級一個黨或一部分人的經濟利益設想，忘掉大衆。所行的政策，足以鼓勵經濟機會以及財富和所得之不均，或足以放縱少數個人吮吸大衆的膏血，形成社會上苦樂不均貧富懸殊的現象而不思加以矯正，這是右的表露。人民間，有一部分人，只圖本身利益，抹殺大衆利益，或是鼓吹既得權益的維持，或是阻撓政府左傾政策的實施，都是右傾的。

對內政策的右傾，近於十七十八世紀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的制度。十九世紀以後的自由主義和資本主義制度，已慢慢轉向。對內政策的左傾，近於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制度。不過對內的左與右，範圍還較這四個主義和制度爲泛，而且遠在四個主義和制度成形之前，早已發生。

丁、經濟的對外政策

從國際一方面講，一個國家如果，消極的：提倡經濟機會均等，各國間一視同仁，以共存共榮爲目的，以國際經濟合作爲工具，相偕改進國與國間貨物的流通，改良貨物的運銷和互換，以提高全人類的生活水準，顧及本身利益之外，還處處顧到不損及他人；積極的，以本國的資金原料和技術，盡力幫助生產和實業都落後的國家，提高其生活程度，並在國與國間主持正義，糾正榨取和利用的行徑。這些都是政策向左的表現。思想或行動的走向這個方向，也是思想或行動的左傾。

與此相反，如果一個國家，消極的只顧本身利害，不顧他人利害；積極的且乘人之危，去侵害別人的權益，遂其一己的欲望。爲人救苦救難，還打着沾人便宜的算盤，或是藉着自身經濟的優勢，榨取掠奪，或要求經濟特權的讓與，或還開發弱小國家的資源引爲己用，諸强之間你爭我奪或互商分贓，這全是右。關閉政策，經濟國家主義，經濟帝國主義，殖民地政策，帝國互惠，經濟壁壘經濟門戶以及經濟集團之建立等，均屬之。

四

綜上所言，我們可知左和右應用的範圍爲如何寬廣。它的精神，既可以寄在執政者，也可以藏之於民間；既可以產生於國內，也可以發揚於國外；既可以由上而下，也可以由下而上；既可以表現爲政治的方略，也可以表現爲經濟的政策；大可應用於國與國間的關係，小可應用於人與人間的關係；可以寓之於思想，可以見之於行動。從時間上看，左和右更不是近代的產物。可以這樣說：從有了政府有了政治的那一天開始，便就有了向左向右的思想和政策。再從大處說，往遠裏看，還可以說，自從人類有了公私的觀念以後，思想中便已有左和右的存在，初不以政治與經濟爲限。政治和經濟的思想和政策不過構成左和右的一小部分而已。所以簡單的說，中國的一句老話「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可以包括消極的左；西洋一句成語「己所欲，施於人」("Do unto others as you wish others do unto you")，可以包括積極的左。「拔一毛而利天下者不爲也」，是消極的右；然若自己不拔毛，反跑去拔人家的毛，那就是積極的右。更抽象以論之，左和右，不過是人類的處世待人之一種態度罷了。社

會上每個人一切行爲的動機，全都可以拿左和右來解釋。

五

時間的前進，無論對內或對外政策，無論政治的或經濟的政策，大的趨勢一律都是向左走的。對內言，國內政治或經濟政策牢守於右，足以造成國內的不寧和流血；對外言，國際間政治和經濟政策之停留於右，足以造成國際間的不寧和流血。換句話說，國內政策的左向，是國內和平安定的唯一保證；國際政策的趨左，又是世界和平安定唯一的保證。欲獲致並維持一國國內的和平，對內政治和經濟政策的向左，是它唯一的途徑；欲獲致並維持世界的和平，對外政治和經濟政策的向左，也是它唯一的途徑。

政治和經濟之間，依我個人主觀的看法，還覺得經濟遠較政治爲重要。偷盜搶刼殺人越貨兇毆暴動革命流血，社會上一切的動亂不寧，起因多一半是經濟的。國際間的戰爭，多一半也不是純由於政治。第二次世界大戰以經濟的原因爲導火線，已爲大家公認。若干歷史學者甚至把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及歷史上國與國間若干次的戰爭，也都推源於經濟。一國政府壓榨盤剝，不讓人民活下去，人民會得叛亂；同樣，斷絕一個國家的生機，她也會動起手來打人。分贓不均，你搶我奪，又往往是帝國主義戰爭的導火線。

許多人又說，有了政治的自由，才能獲得經濟的自由；沒有政治自由，如果斷等以求經濟的自由，這種經濟自由往往落空；既得之也不能持久。這個說法，事實上並沒有根據。從歷史上看，民權運動往往是由崛起的中產階級發動，爲自身的經濟權益去找保障。民權發展之後，資本主義隨以勃興，這趨勢，政治上說來，是趨左的；而經濟方面看上去，本質沒有大變，財富偏在尤甚，還是向右的。就拿眞正的民主國家來說，政治自由開放了幾百年，果眞經濟的自由得到實現，則勞資關係的對立與矛盾，財富分配之不均現象，應該早就泯滅無遺了。實際上沒有。

九月三日　杭州

論現行的留學政策

季羨林

前幾天，胡適之先生在報紙上發表了他的教育十年計劃，目的想在十年以內替我們中國的學術開闢一條獨立的路。據報紙上說，胡先生自己也承認這是一砲。這一砲果然沒有虛放。自從這談話發表了以後，南北各地，許多刊物和報紙都有文章來討論這問題。有的贊成，有的反對。眼看就要引起一個大規模的論戰。昨天一個小報上說，胡先生已經掛了免戰牌。我不知道這是否是眞的。我今天也來討論這問題，並不是想製造「事件」，再啓戰端。我只是因爲自已有許多話要說，以前雖然也說過幾句，但總沒有說痛快，現在就利用這機會再來亂說幾句。

胡先生談話的前半是關於留學政策的。他反對政府每年化大量的美金送學生到外國，尤其是到美國，去鍍金。這意見我完全贊成。自從去年十一月間汪敬熙先生首先發難攻擊自費留學以後，有許多人都來寫文章討論這問題。我自已也在天津大公報上寫過一篇短文，響應汪先生。我當時只談到自費生。我的意思並不是說自費留學生全要不得，官費生全好。自費生也儘有很好很有成績的，而官費生裏面也有不少的紈袴子弟，一點書也不念。不過因爲汪先生只談到自費留學，而官費生究竟還有點限制，所以我就大作其偏鋒文章，彷彿我同自費生有什麼宿怨，大有同他們不共戴天的意思了。

我現在要談的是整個的留學政策。不管官費與自費，現行的留學政策都有毛病。假若我們現在還不起來糾正，這樣下去，再送一百年留學生，中國學術也不會獨立，永遠只是跟着別人跑，而且永遠隔着一個很長很長的距離。

現行的留學政策的毛病究竟在什麼地方？這眞如一部十七史，不知從何處說起。我們先說留學的動機。我想有很多人到外國去，並不是想去念書。他們只是想去混一個資格，回來好作事，就是所謂「鍍金」。這實在也難怪，因爲中國社會把留學生看得太重了，彷彿一個人只要有機會到外國去吃上幾天麵包牛油，立刻就可以脫皮換骨，變成另外一個人了。當前的政府要人，大學教授，有幾個沒有鍍過金的呢？難怪一般人，尤其是青年們，想盡種種方法要到外國去了。

因了這樣的動機而到外國去的，我們就很可以想像到他們到外國會不會念書。他們一下火車或船，第一件要緊的事情就是打聽，那一個學校最容易，那

一個教授就好過關。教授選定了，第一次見面，說不到三句話，就張嘴要論文題目。論文題目一拿到手，當然毫不遲疑立刻就向這題目進攻。在英美情形或者好一點，因爲英文他們在中國都學過，也許（我只說是也許）沒有語言文字上的困難。在德國法國就有了問題。在國內學過德文法文的很少，一到了那裏，話聽不懂，書看不懂，甚至到館子裏去吃飯，到街上去買東西都有困難。但對論文進攻的勇氣一點也不減少，自己在下面作的時候，還可以找別人幫忙。倘若教授要請他去討論，立刻就來了困難。教授說話，他聽不懂。他說話，教授聽不懂。在這種情形之下，就可以看出我們的文化究竟高於西洋。有很多的先儒都提倡「不動心」。雖大難當前，此心皆可不動。現在說幾句鬼子話聽不懂又有什麼不得了呢？他仍然能沉住氣，臉上的汗毛都不許豎一豎。但洋人教授却受不了了，頭上的汗立刻流下來，青筋也一條條地暴露出來，呼吸緊促，心也跳動得厲害了。一位德國教授告訴我，他同一個中國學生談一次話，他彷彿經一次衝鋒，說起來還有餘驚。

讓外國教授衝過幾次鋒以後，論文終於進行起來。這時候需要教授幫忙的地方更多了。於是有許多中國學生就施展出另一套中國人特有的本領：送禮，不客氣地說，就是賄賂。當然他們還不敢像在中國一樣公然送錢給教授，因爲外國教授還沒進化到能懂得貪污。今天請教授看戲，明天請教授吃飯，教授太太生日的時候，絕不會忘記用高得荒謬的價錢買花送了去。他們覺得這樣也就可以勉强安心了。有些勇氣大的，買了照像機之類的貴重東西送了去。教授看了，大驚失色。他們不知道中國學生的用意何在。在惶惑之餘，讓中國學生再把照像機帶走，自己留在家裏納悶。心裏說不定又想到那個「中國之謎」。

好容易費盡九牛二虎的力量把論文作完，或請求教授認爲是作完，他們就開始預備口試。同時心裏已經開始作回國的計劃了。好歹口試再及了格，有些人連等候領畢業證書的耐性都沒有，立刻就捆起行李來回家。博士頭銜終於拿到了。他們又可以利用這頭銜再往高處爬，對他們說，這總算是功行圓滿了。

請讀者不要誤會，認爲所有的留學生全像我上面說的那樣子。我上面只是說了留學生的一種，不過可以說是最普遍的一種。在這一種以外，也有不少的學生眞正埋頭讀書，讓外國教授都佩服的。但也有許多學生根本一句書也不念，終日遊手好閒，坐咖啡館，找女朋友，甚至販賣黑貨，上法庭，坐牢獄，專門替中國丟臉。在數量上說，這一類的學生非常多。國內達官貴人的孩子幾乎全屬於這一類。倘若列一個等級的話，這一類恐怕是最下乘。回頭再看這一些專門到外國去考試的學生，就覺得他們也未可厚非了。

但是，無論如何，就連這些「未可厚非」的學生對中國的學術也不會有什麼裨益。我們派留學生的目的是要到外國去學在國內學不到的東西。但他們却帶了一肚皮在國內大學裏學到的一知半解的學問，到外國去給自己鍍金。他們就用了這點學問，七拚八湊，在外國教授全力幫助下，勉强寫出一篇論文，立刻就回來了。我不信，他們能學到什麼新學問。

據我自己的觀察，中國學生的天資最少也可以同外國學生比肩。只要肯用功，他們是不比人家差的。但可惜的是，不肯用功的學生固然不必說了，連肯用功的學生也只肯用到學業結束爲止。彷彿證書一拿到手，學問就已經登峯造極，用不着再求進益了。平常我們都認爲是形式上的一個學業結束，對很多的中國學生就眞成了結束。但對外國想終身從事學術研究的學生這不過纔是一個開始，在沒考試前有許多限制，自己不能任意隨了自己的興趣研究。現在這限制沒有了。自己可以任意研究一個題目，讀一本書。再沒有什麼東西來束縛限制自己的天才和自己的興趣了。所以我們觀察一個外國學者的經歷，雖然有不少的人已經在學生時代露了頭脚，完成很有價值的學術工作；但大多數的人都是在考過畢業以後纔眞正漸漸走上研究的路，終於成了大學者。這條路有時候是很艱苦而悠長的，說不定同時要忍受精神和物質兩方面的壓迫。但世界上沒有不勞而獲的事情。學者們走這樣一條路也沒有什麼值得驚怪的。

在現行的留學政策下送到外國去的學生頂多也不過走到這條路的開端，向悠悠的前路看一眼，也許根本連看一眼都不知道，就鍍滿了一身金回來了。回來了以後，覺得已經功成名就，不願意去作官的十有八九可以作到教授。同他們同學的外國學生這時候纔走上那條悠悠的長路，路上有許多困難要克服，要有無比的勤勉，驚人的耐力，纔能一步步走上去。說不定十年八年，甚至還需要更長的時間，纔能得到一個教授的頭銜。倘若這兩位同學再有機會會面，我們中國的這一位教授就會發見，以前說不定功課還不如他的這位外國同學，現在眞正可以稱得起一位學者了；而自己却連以前學的那一點都有點模糊了。這是他個人的悲劇，也是我們中國學術的悲劇。

倘若我們看着這悲劇演下去，中國學術永遠不能獨立。但現行的留學政策就正是支持這悲劇的。有的人會說：我們也可以派留學生出去，讓他們在外國一直住到把那條長路走完，最少也可以在外國大學裏作到教授，然後纔讓他們回來。但試問，這還能行得通嗎？先不必說政府沒有這許多錢，送大批留學生在外國住那樣長的時間。卽便政府能有這樣許多錢的話，有幾個人肯在外國住這樣久呢？

所以，無論從那方面說，中國現行的留學政策都非要改變不行。我並不是說，只要我們的學生都安安穩穩地住在中國，新的學問就會從天上往他們腦袋裏灌輸；我們用不着借助外國學術的研究，我們的學術就可以獨立了。不但我們中國作不到這一步，連世界上的學術先進國也不能每一科都研究到家而不必向別人學習。他們有時候也要派學生到外國去學習的。我的意思只是說，要讓學生到外國去留學，造就大學教師，替中國學術撐門面，這不是一個永久的辦法。

但我們究竟應該怎樣辦呢？我覺得，我們最好的辦法，就是請外國有地位的學者到中國來。這當然並不一個新辦法，一直到現在我們的大學裏還有不少的外國教授。但是，我們截止到目前所請的外國教授很少有眞正有地位的學者。他們多半都是一個普通大學畢業生，在外國找不到飯吃，於是就到中國來作教授。他們唯一的本領就是能說外國話，談到學問，有的還不如我們中國的大學畢業生。這種人對我們的學術不但沒益，而且有害。我常常自己想像，當這些人回國的時候，也許有人問他們在外國的職業，他們當然回答說是教授。我眞不知道，他的國人會把我們中國的大學想成什麼樣子。我一想起來，臉上就發燒。從現在起，我們應該請在外國眞正有地位的學者到中國來任教。他們當然未必全肯到中國來，我們可以仿效蘇聯請美國工程師的辦法，出極高的薪金。「重賞之下，必有勇夫。」一定不會沒有人來的。這樣可以有兩個好處：第一，他們可以長期留在中國。學生在大學畢了業以後，甚至作了講師以後，還可以有機會同他們研究。不至於半途而廢，演了我上面提到的那種悲劇。第二，有天才的青年不致因爲沒得到留學的機會而埋沒了。我們都知道，照現行的留學政策作下去，只有一小部分家裏有錢或運氣好的青年纔有留學的機會。這些青年未必就是最優秀的。倘有外國大學者到中國來，沒有錢的或運氣不好的青年都可以有機會發展自己的才能了。這對中國的學術是有莫大的裨益的。倘若有時候有些部門某一國研究的特別好，我們仍然可以派學有根抵的學生到那裏去觀摩。這樣，我們一定可以慢慢走上學術獨立的路，這是我可以斷言的。

以上說的話，我當然不敢說全對。但這些話都是由多年的經驗和觀察得來的，自信還不至捕風捉影。爲中國學術前途計，我誠懇希望教育最高當局能考量並採納我這個建議。

一九四七年九月廿三日　北京大學

中國的對美政策

The China Weekly Review

China's America Policy An Editorial Sep. 27, 1947

關於美國的對華政策，已經寫得很多，但是中國的對美政策，這些日子卻極少聽人提到。從世界關係及其所生影響的觀點上來看，美國對華政策更有其迫切的重要性，這一點當然大家都瞭解的。過去幾年來的中國對美政策，主要地只是美國政策的一種反響，而且永遠是遵奉美國聲明和行動并受其模造的一種政策。

此種狀況今天依然有其某種程度的確實性，而過去幾星期內的種種事變，以孫科博士警告美國的談話爲頂點，已使中美雙方感到密切注意中國外交政策的方向，實在更顯重要。詳細研究中國的對美政策，尚須等待時間和歷史學家來完成，但是我們卻有興趣來分析（即使是表面下的分析）一下過去三四個月內的種種事實。

中國對杜魯門主義發期的反響是迅速而積極的。她指斥外蒙古侵犯新疆邊界。進一步又指責極像蘇聯飛機的飛機參加越境進攻，深入中國領土。中國的報紙就大叫大喊，亂嚷一通，而抗議文字就紛紛拍發出去。緊接而來的第二步行動，就是南京指責受北朝鮮「某一强國」訓練和配備的幾千朝鮮共產軍，在東北與中共並肩作戰。之後不久又是據「可靠報導」，大約有三十個蘇聯軍事顧問，曾在四平街觀戰，他們就在那裏積極指導中共策略。

如果想到杜魯門主義用於中國，結果卻會發生了這許多重要的外交陰謀，那末當初的計劃者們必將大爲失望了。然而中國卻又作了一次「形容」。孫科博士發表了一篇使人驚愕的談話，他痛斥蘇聯干涉中國內政。政策的計劃者們顯然覺到，此舉一定可以驚醒美國，注意共產主義在中國的種種危險。政府報紙充份利用這個時機，詳細指出這位孫逸仙博士的獨子孫科博士，素以親蘇傾向出名，誰也不能指摘他是反蘇份子，因此他突然痛斥蘇聯，所持理由必定都

是正確的了。

然而華盛頓不管這一切的艱苦工作，依然繼續集中努力於歐洲，而且幷不表示有發動對華更積極政策的徵兆。最後美國才宣佈，派前美軍駐華司令魏德邁將軍到中國和朝鮮來，執行調査事實的使命。中國以自身與希土並列的積極外交政策，一時似有即將放棄的模樣。批評者和發議者們都估量這個使節團，就是積極援助國民黨新政策的第一步。然而出於大多數人的意料之外，魏德邁却是眞的來作一次調査事實的旅行，而且所發現到的種種事實，又都不合其意，這許多事實都引論到國民政府內部必須實行種種激烈改革。這許多事實也反對自動地將中國當作希土一類國家同樣看待，因此也就反對以任何進一步的迫切援助給予現在的國民政府。

我們就得從這一點上來理解中國對外交政策的尖銳改變。不過自杜魯門聲明發表以後，中國對外政策雖已採取較爲積極的性質，然而它仍始終緊緊跟着美國政策跑，而且竭盡一切力量，決不在那一方面觸犯美國。

魏德邁使節團完成使命，以及根據他離華公開文告中所說任何進一步援助須以改革爲條件的指示發表以後，中國的政策就從甜言蜜語和諂媚奉承的親善政策，改變成爲一種威脅的政策了。大約二星期前，中國發表一篇聲明，說是中國對於美國在日本的政策深表關心，這是實行此一新路綫的第一個步驟。中國一向只是依賴美國，支持美國在日本的種種行動，雖然這類行動對中國民族利益，淸淸楚楚地均有害處的，所以過去二年來，國民政府的破產例子，沒有比這更好的了。

中國宣稱對於建議中的對日和約會議中國不擬參加，這是中國以威脅手段，恐嚇美國恢復盲目援助國民政府之政策的又一個徵象。因爲中國知道得很淸楚，中國方面拒絕參加，其意義就是美國計劃的失敗。美國在管理戰敗日本二年以後，覺得還是趕速簽訂和約爲得策。因爲美國直接違反波茨坦協定的精神，已經實質上排除英中蘇平等參加管理日本的份頭，所以美國很明白，如果要召集一個討論日本和約的預備會議——這也是違反波茨坦精神的——她從「夥伴們」那裏所遭到的除反對以外，別無他物。然而因爲大不列顛已經將自己抵押給美國，而且已經絕望地陷入美國龐大的政治經濟擴張計劃，不能嚴加反對，所以美國已經敏銳地估計到，堅決反對此一計劃的只有蘇聯一國。中國直到現在爲止，對於美國政策。幷無不同意之處，所以也放在援助美國的這種估計上的。可是因爲蘇聯出來攔阻，英國不願參加，而中國現在也直接表示反對，美國要想進行、殆亦不可能了。

一連串新外交活動的最顯明的標誌，——又是孫科博士的一篇談話，他僅在三個月以前，曾經發表談話，痛斥蘇聯的不友誼和干涉中國內政，但此番却與前次談話直接相反，竟宣稱既然美國一心採行不利中國的政策，那末中國只能向別處去找一個新朋友，或將傾向蘇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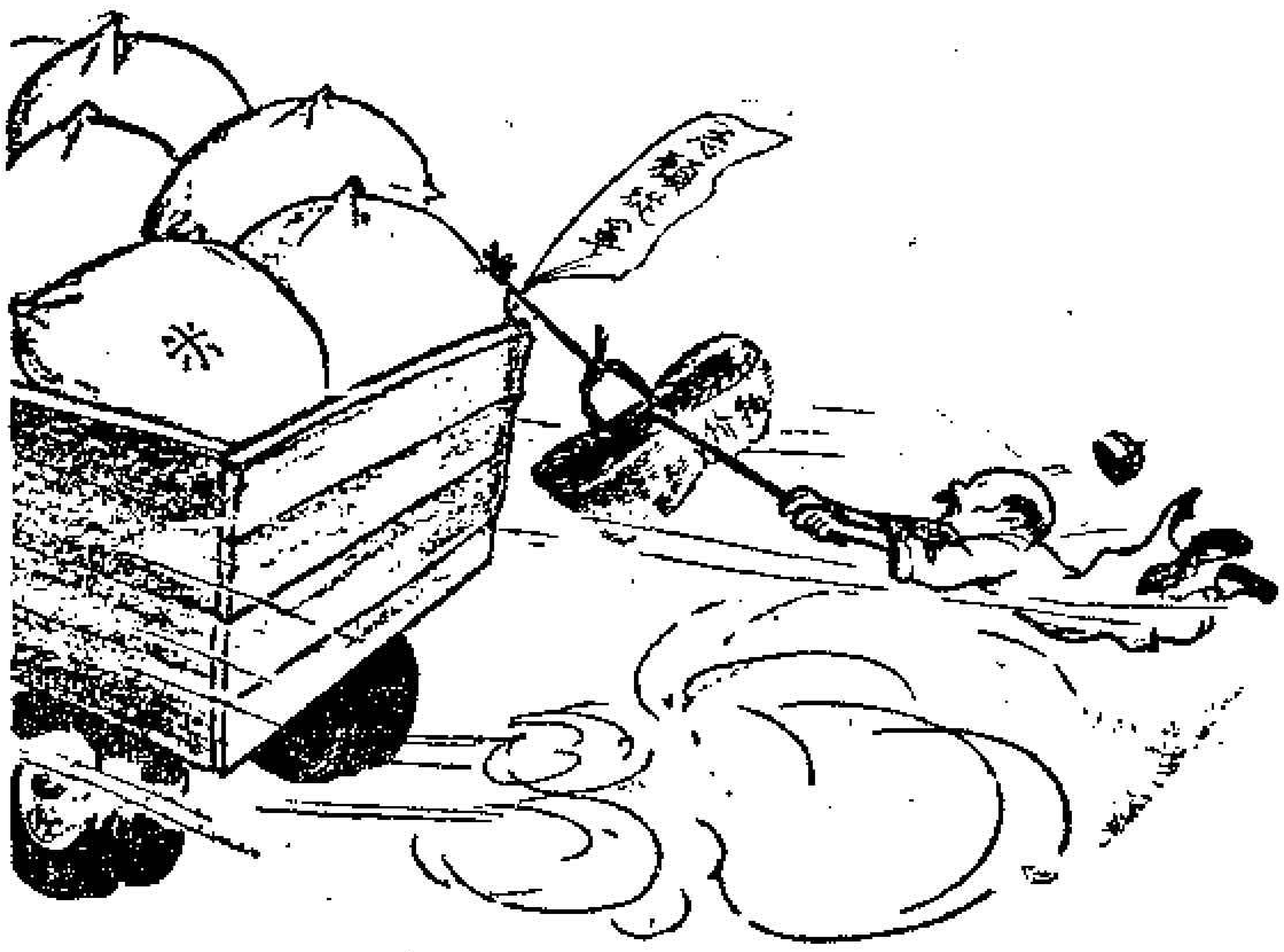
因此我們對中國對美的外交政策，已可獲得兩種界限分明——而且是矛盾的——傾向。我們心中認爲這兩種傾向，沒有一種是特別聰明的。但是那第二個傾向，雖然幷非建立於可以證許的動機之上，但也許有可使美國對其迅速發展杜魯門馬歇爾計劃控制全世界的行爲，暫時躊躇思索和反想一下的好處。

這兩種政策究將產生什麼結果，很難斷定。從中國的觀點上看來，二者都準對着一個相同的目標——更多的美國援助，尤其喜歡直接賜予巨額美元的那種形式。在這一點上，提早發動反共行動以及共享杜魯門主義爲阻止共產主義的贓與物，看來似乎已經失敗了。中國採取威脅手段的新政策這個事實，似乎就是指出中國也認爲第一個政策已無成功之望。今天也許只有杜魯門和馬歇爾，才能知道對於中國與蘇聯「友善」的威脅政策，美國將有若何反響。也許他們目前尙不知道。我們這班人只有袖手等待，然而，當我們在等待着的時候，我們可以積極注視過去和當代兩方面種種事變的發展過程，這對目前局勢都是大有供獻的。我們這班小人物，只有以我們自己去關心這許多事件，以及時時發表我們自己種種觀點的方法，才能希望將我們的意見，去強制影響中美變方的上層人物，他們常常在嚴密關上的大門後擬定的種種決議，而逼到我們採取若干行動，其中有許多行動顯然對我們並不是最有利的。（文覺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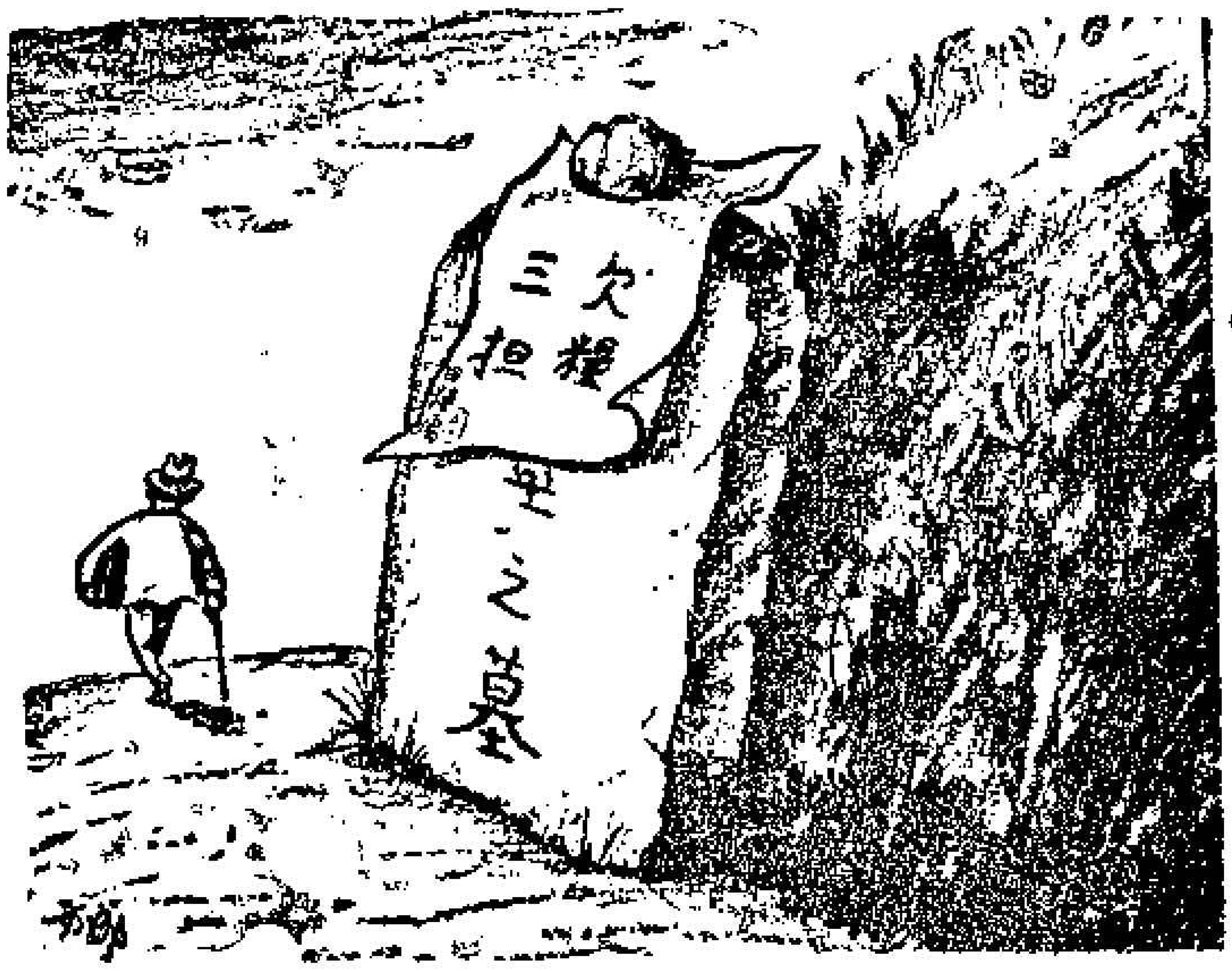
正誤

本刊三卷四期所載梁漱溟先生所作「預告選災追論憲政」一文，錯字甚多，茲將重要者正誤如左：

頁碼及行數	誤	正
8下7	武力言決	非以武力解決是已
8下13	欣羨	歆羨
9上23	恒若	恆苦莫能至
9下15	在此	坐此
9下20	一般	一段後期運動
9下26	未易	未明
9下29	也無他	此無他
9下29	（唯和合得統一）	—唯和合得統一—
10下3	自來中國所獲致者，不在物而在人……	自來中國學術所致詳者，不在物而在人……
10下5	是能處已有能皆得	是能處已有以自得



更殘蠟盡



楊可揚作　　攔路告狀（木刻）

嘿嘿，倒霉！
（轉載 NEW HAMPSHIRE MORNING UNIN）

觀察通信版

長城線內外的爭奪

觀察記者

（觀察專稿）

從山東主戰場演變出來以劉伯承及陳毅一部的南下為主體而形成的從黃河到長江的軍事大轉盤，記者已於上期略述梗概。在黃河以北及長城線內外廣大的北部中國土地上的撕殺搏鬥，有如不緊不慢的秋雨，淅瀝淅瀝的落著。其中「時」「空」的徐緩變化，無疑的將是決定未來北方戰局的重要因素。看吧！「碧雲天，黃花地，西風緊，北雁南飛，曉來誰染霜林醉」？

華北的脊樑

國軍為了首先爭取沿海，將山東做為主戰場，使太行共軍得以坐大；同時胡宗南為了獲得政治上的影響，抽調晉南之兵攻擊陝北。當陝北與晉南「換防」之後，山西關係方面以譏剩與不平的口吻說：「丟掉一隻肥牛，換來一塊骨頭。」山西是華北的脊樑，在整個華北形勢上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有人說，「天之急在上黨。」九曲的黃河自寧夏到綏西折而南，包起了山西的西南兩面，太行障於東，長城屏於北，內有呂梁，中條之固，使山西成了表裏山河的天然形勢。戰國時晉國有近百年的霸權。李唐以山西起家，趙宋統一中國，最後才底定山西，這一切都與天然的地理形勢有關。國軍大部退出晉南以後，共軍聶榮臻部又折斷了正太，使山西太原成了萬山叢中的孤島。在山西握有卅六年統制權的閻錫山，其形勢的偏促是空前的。在晉南共軍渡河入豫時，閻錫山並沒有敢向晉南伸展其勢力，實力如何可以想見。可是共軍會全力奪太原嗎？這個似乎也無此必要。他們不攻堅，更犯不上逼著閻錫山作困獸之鬥。尤其在政府首先爭取沿海的戰略決策下，山西一時還不會有大戰事。但是雙方為自保與壯大，小據點的爭奪是會持續不斷的。

「蒙疆」局面

傅作義張垣綏署的轄區，正相當於偽蒙疆自治政府的地盤——察綏兩省各盟旗縣再加上雁北十三縣。在本刊三卷二期「戰局鳥瞰」一文中，記者曾判斷察綏仍可持續其小康局面。第一是地理上的關係，第二傅作義也是比較有些小辦法的人，張羣院長張垣綏察歸來，曾稱傅主任不僅長於治軍，而且長於牧民，有人批評「傅作義是優秀的政治演員」，這話也有相當道理。在人生劇場中，所謂政治還不是一幕一幕的層層不窮的戲嗎？在今天能演就算不錯了，看，不是還有很多毫無演技的人也在台上幌嗎？

熱察綏塞外三省，在地理形勢上應當是一個區域，可是由於張作霖從東北侵入熱河，張學良繼承父業，由東北三省而為東北四省，日人侵據東北也就將計就計，將熱河劃入偽滿。勝利後東北接收又是將熱河劃入東北。這樣最近歷史的沿襲竟使塞外內蒙三省分了家。其實這是不合理的。現在雖然熱西防務一部分歸張垣綏署，但是塞外的小康局面仍限於「蒙疆」，而達不到熱境。同時因為熱境的不安，使察東也時常有事。最近察東北多倫、寶昌、沽源等縣通張垣的公路，由於蒙共的活動，已經不通了。熱西也有小接觸，即此是否會打破那裏的小康局面呢？一時恐怕還不會。東北華北的戰事以爭取長城線與北寧路為中心。西北共軍六次攻勢正式開始，冀熱遼軍區共軍當然要以全力援北寧路山海關內外各據點。如果察綏河北國軍沿長城線南北向東追蹤共軍，或許將來會更加重傅作義在塞外的任務。也就是說以遼綏小康基地，向熱境發展。

平津保三角地帶

保定綏署任務是在於確保河北各交通幹線，及沿線平、津、保、石、唐重要城市，工礦、及港口，以支援東北。因為在目前東北國軍控制區域，僅佔東北全面積百分之七至九。大部的部隊聚集在狹長的地帶上，沒有寬裕的後方是相當危險的，自然要以河北為依據，而河北本身也只有點線的控制，廣大的面還在共軍手裏。要想確保平津使各大城市及交通線，必須控制平津保三角地帶。從夏間國軍已將防務由永定河推至大清河，上月中旬共軍聶榮臻部以二四兩縱隊主力反攻平津保三角地帶，事先佯攻石門，繼而又以第三縱隊攻徐漕，再攻淶水房山，都是為了吸引國軍主力西移，然後突襲平津保三角地帶。如果得手，甚或要衝斷平津路，打通其冀中與冀東的通路。國軍認定了共軍是在聲西擊東，重兵屯紮霸一帶未向西移，經過一場惡鬥，將共軍二四縱隊打退了，官方宣稱共軍死傷二萬餘人。平津三角地帶重入國軍掌握，平津交通得以確保，被破壞後的平保交通亦已恢復，保定綏署及河北省府原均已遷往保定，在北平沒有辦事處，最近綏署省府辦事處已聯合遷往豐台，這華北陸路交通樞紐的豐台已經成了河北的軍政重心，軍政當局固然是為了交通通訊的方便，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切實控制平津保三角地帶。還是一句舊話，打仗就是鬧蹩扭，你希望他上東，他偏往西，你希望他打狗，他偏打雞。在山東，國軍希望將共軍壓至黃河以北，他卻南竄去了，過了黃河，過了隴海路，而且還有的過了長江。在河北國軍希望將共軍向南壓抑，而他卻一步步的北來，石門、徐漕、房山、淶水，現在又有另部在冀東活動着。河北現有國軍的實力除維持交通線及保護工礦港口外，頂多能控制平津保三角地帶及冀東。大清河北平津保的三角地帶是又進駐了，為了配合東北他已開始注意冀東。

冀東與熱河

熱河冀東及長城線內外地區屬共軍李運昌的冀熱遼軍區。這個區域是關內外的走廊，勝利接收之初，國軍控制了北寧沿線的沿海地區，並從而楔入東北。去年九十月間國軍掃冀東，後又進駐熱河承德，冀東各縣城一度收復，熱境也收復了十七個縣城，後來化整為零的共軍又漸漸聚集起來了，退往熱北遼西的共軍也隨着東北共軍前後發動的五次攻勢向熱境滲透反攻。到目前止，冀東寶坻、薊縣、盧龍、都山、興隆幾個縣城及大部分土地仍在共軍手中，而熱省在國軍手中的十七個縣已經變成了七個縣城，七個縣城也被割成兩塊，熱東兩縣，熱西五縣。共軍從通遼或林東林西經赤峯，葉柏壽，凌源，打通了一個穿過長城到冀東的寬闊走廊，使冀熱遼軍區又一天天的壯大起來，威脅着北寧路及關外的交通，成了共軍發動六次攻勢的有力的一隻支柱。據官方消息，共軍熱河省府設赤峯，已將熱境劃為東、西、南、北、中五個軍分區，每軍分區有一基幹團，人數不等，多者三千人，少者一千人，另外有野戰部隊五個旅約三萬人

劉伯承南下記

——大別山戰鬥紀實

攻涉

編者先生：我是安徽的一個新聞從業員。這次劉伯承南下大別山，戰鬥詳情，我們都比較清楚。六安、舒城、霍山等地收復後，我也都去實地採訪過。但是這許多材料，普通報紙上是都不會刊載的。我特地寫了寄投貴刊。文中所記，都是千眞萬確的。我本着良心，絕無隻字偏袒任何方面。

（觀察合肥通信）自共軍由魯西南下大別山，迄今已足足兩個月了。劉部進大別山在九月上中旬時，眞是叱咤風雲，要什麼地方就拿什麼地方。現在劉部又從已得各縣縣城撤退出來，轉在各縣城以外的面上打主意。目前雙方軍事，呈現膠着狀態。

長驅直入

自七月下旬魯西羊山集，爲共軍劉伯承部三個縱隊，（每縱隊轄三旅）包圍後，一時魯西情況，極爲緊張。這時駐紮淮北之五十八師魯道源部，除留置一團進駐河南永城防守外，其餘全部北調，解羊山集之圍。淮北防務因而空虛，土共魏鳳樓、金少三、李仁林等股，乃乘機紛紛四出活動，當將皖北亳縣、河南鹿邑、拓城等縣城攻陷，並向永城進攻。此時淮北整個局勢，已呈動盪不安之勢，徐州外圍亦受重大威脅。徐州陸軍總部爲穩定淮北局勢並解除徐州威脅起見，遂命蚌埠第八綏靖區司令官夏威爲所轄四十六師譚何易師長率兵四團，出擊亳縣、鹿邑、及其以南地區之土共。譚何易當即派兵一部進駐界首，一部進駐亳縣、及門集，師部率一個團駐渦陽，後正計劃第二部進攻佈署。八月十日，十一兩日，劉伯承部因抵不過國軍壓力，率一、二、三、六、七、五個縱隊約七萬餘人，越隴海路南下，以致淮北情勢較七月下旬尤爲緊張。魯西跟踪追擊劉伯承部的各路國軍，已疲困萬分，雖勉力追趕，然距劉部均在兩日以上行程，淮北又無重兵扼守，因是劉部得以從容長驅南下。駐皖省境內之四十六師適得收弦易張，重新佈置，集結主力於渦陽附近。一部置於張村鋪，以圖側擊南下之劉部。彼時劉伯承部之主力則於淮陽以西渡河，陷沈邱、項城，向豫西之新蔡方向前進。其第三縱隊（記者按據八綏區司令部高級人員談：劉伯承之最精銳部隊爲三、六兩縱隊，在魯省戰場，從未吃過敗仗，戰鬥力強，且配備精良），南下圍攻太和，企圖渡大沙河，再南行而入大別山。國軍四十六師新十九旅於八月十六日先進入太和，共軍第三縱隊於十七日進抵太和城郊，當以全力將太和團團包住。譚師長以所屬十九旅陷於重重包圍中，即兼程率師至太和以東，與劉伯承之第三縱隊發生正面激烈戰鬥。共軍作戰原則：一不作無謂犧牲，二不攻堅。故在太和相峙一日，見無進展，乃改變硬攻太和之念。同時怕時日經久，中央援軍到達。增加他進大別山之困難，且又不能達到拖疲國軍之任務，除留一部仍佯攻太和，以掣肘防守太和的國軍外，其餘均分別在槐店、紙店集、新安集、舊縣集渡過大沙河。等到四十六師發現敵方過河，忙抽調兵力攔河截擊時，他們已過河的已有一萬六七千人了。此時五十八師亦趕到太和接四十六師的防。四十六師因皖北重鎮阜陽城防空虛，恐爲渡河之共軍攻陷，遂將全部移駐阜陽。渡河之共軍一部五六千人，此時已到達阜陽以南大橋集，焦波渠，及阜陽西之龍王堂、大田集等地附近，與星夜南下尾追之四十六師接觸，作正面之阻止。掩護一、二、六、七四個縱隊到達淮河北岸，由三河尖附近全部渡過淮河，劉伯誠親率警衞營一營分乘十三輛重達二噸半的美式大卡車，指揮大軍進佔固始。固始於八月二十四日無聲無息的淪陷了。四十六師雖於此時已渡過淮河尾追，卒因共軍實力雄厚，未敢輕擧窮追。商城亦於此時告急，潢川光山均相繼失陷。待五十八師趕到固始後，四十六師移防霍邱西固始東之分水亭，與共軍復發生戰鬥。四十六師雖拚力進攻，但却遇過了强大的抵抗，被阻無法前進。雙方對峙兩日。譚何易師長迫於勢單力薄，乃與五十八師協力轉攻固始。分水亭方面防守不堅，劉伯承又指揮所部離開固始、潢川，向葉集進逼，而葉集方面（葉集位於大別山北麓，爲進大別山之孔道，亦大別山外圍之重要軍事必爭之地），第八綏區司令部雖由水家湖車運四十六師一八八旅之陳鐵漢一團及皖省保安第四縱隊一營共同防守，但無論如何也抵不過超過二十多倍兵力之共軍攻擊。故葉集僅戰四小時，此一大別山之重要門戶即宣告失陷。商城也於八月廿九日爲劉部第一縱隊佔據。此時大別山之核心立煌，空虛得無一兵一卒。葉集失陷後，陳團長即奉命移駐立煌死守，葉集損失慘重。越二日，譚師主力抵葉集後，即開始猛攻。五十八師進攻閤城。葉集方面共軍分兩股，一股兩千餘進佔霍邱南葉集東之桃李鋪、一股四千餘人進佔東南之開順街。該兩股探知六安無兵把守，（六安此時僅有縣自衞隊五個

，野戰軍連同地方團隊約有五六萬人。在冀東方面有四個獨立旅（九，十，十一，十三），另外有四個團及警一警二兩團的番號。合計也有三萬人左右。其第十旅已出現於錦西戰場。熱境以赤峯爲中心，向各方擴展交通線，以生產車來往搶運物資，傳有百輛大卡車經常行駛。在冀東方面，共軍亦正趕修四條公路線：（一）由赤峯至平泉，（二）冷口至凌源，（三）界領口至綏中，（四）由遵經建昌營至遵化，以聯絡冀熱遼三省及長城線內外。共軍此種兵力配備及交通之整理，顯然是要堅强控制長城各要隘，以便東向破壞北寧路，作爲東北六次攻勢之先奏。

東北共軍六次攻勢

天津大公報九月三十日載北平行轅參謀長徐啓明之談話稱，「北寧線雖已恢復通車，錦西情勢趨穩，惟共軍在遼西走廊仍有相當兵力，繼續進犯在逆料中。共軍之進攻北寧線，可以看做東北共軍六次攻勢之開始，因在時間上距五次攻勢已有兩月之久，在季節上也正是東北作戰時期。搶糧毀礦，孤立東北，他都要從北寧路下手，切斷北寧路，然後自冀東遼北進攻，爲共軍順理成章必然的戰略企圖。」徐氏此種看法，可以反映軍事當局對北寧路之注意。北平東北兩行轅夾縫中之長城線，將爲東北共軍六次攻勢全面發動前之主戰爭地。聞傅作義現已一部增防冀北，而以平大線新編組之新二軍向冀東推進。北寧線關內段在趕修毀中，仍兵車絡繹，軍運繁忙。北平行轅將以全力應付長城內外戰事，以確保北寧路支援東北。同時關外遼東遼北部隊一時恐不至調北寧線增防，以備共軍北寧線後另一攻勢的開始。目前華北及長城線內外的情勢，無疑的是：「長城內外，幾低徊，易水風寒孤雁哀，塞上秋深烽火緊，遼陽鼙鼓動地開」。（十月四日）

中隊），乃乘虛一鼓而進入六安城，六安遂於九月二日午失陷。

六安戰役

九月二日晨七時，共軍劉伯承部先頭部隊一股約五百餘人，自六安河西偷渡過淠河，由上龍爪打了幾槍就將六安城內之險要孔道鼓樓佔領，繼續向縣府攻擊。六安城防空虛，但尚有縣自衛隊五個中隊，六安團管區二個中隊。團管區的兵，是征集訓練壯丁的部隊，平時素無戰鬥訓練，且因其本身又無守土之責，故一聽到槍聲，都棄甲曳兵愴惶的逃跑似的出了六安東門，順着羊腸小道跑了。縣政府的五個自衛中隊在鼓樓，了一小時，也想撤腳就跑，奈以縣太爺衣服行裝尚未收拾好，故又停下來打了兩小時。此時縣太爺陳漢流之細軟物品已經打裝停當，由三個中隊掩護從六安小東門外六德公園逃出。十時半六安的自衛隊完全撤出。十一時共軍的大隊人馬已到了六安，在六安全城搜索了一遍，六安就這樣的拱手讓給他們了。三日共軍一、三、五、廿一、二十七五團人就齊集六安。劉伯承四日騎了一匹黑騾子也到了六安，當即召開民衆大會，並將他們委派的縣長宋某介紹給大衆。宋某是河北人，三十多歲，口齒爽利清晰。他說他是復旦大學學生。他並向民衆說，他們的軍隊是不拉伕，不擾民的。他們是人民解放軍。他們來是解放被壓迫的勞苦大衆的。你們還不要怕，更不需要跑。我們是來打國民黨軍隊的，與你們無干。老百姓聽了很懷疑他底說話，但後來住了幾天，他們的軍隊眞的不拉伕，不擾民。據說，他底部隊非到迫不得已時，絕不住民房，學校，及其他文化教育機關。到了非住不可的時候，他也事先派人和您講好。假使你膽大的話，不答應他住，他也不會發氣，他會更耐心的向你商量。總之他非達到他底目的不可，而在手段方面，是用說服的，耐心的商量，終至使你在面情上不好意思，再說不出個不字來。等到隊伍住下來後，要是向老百姓借用東西，也是像上面態度一樣。他們懂得了用强迫欺壓的手段去進行一切事情，在老百面前，無疑義的等於叫老百關門逃走，拒大衆於千里之外。他們的士兵曾同老百姓閑談，說我們打仗不是光是爲了爭地盤，我們最大的任務還是爭取老百姓（同情）。我們軍紀不好，老百姓便不敢跟我們接近了，光光佔了個城市又有什麼用呢？那時不能向空城宣傳政治和共產主義好。叫老百姓信仰，就是宣傳的再好，老百姓也是不會相信的。他們的官長待遇和服裝完全和士兵一樣，局外的人是看不出來的。他們的軍紀確實是嚴明的。

被俘以後

六安失陷時，被俘的公務員共有三十九人（後來跑了五個）。他們都受到優待。六安縣警察局長范家槐被俘時（穿了便衣），他說他是小學教員，以後也就客客氣氣的放了他。范出來後，傾向他所認識的人們報告他是怎樣的被俘，怎樣的受優待，又怎樣的被開釋。共軍的一個團指導員並很親熱的向他說，要他好好的辦教育，以造就下一代人才。六安司法處裏的法官被俘的也有三四個。六安直接稅局的局長太太和兩個職員也在同時被俘。那位局長太太，裝扮非常妖豔。當然因爲她底丈夫有錢，後來就被「清算」掉了。共產黨對於華麗裝束，及生活特殊待遇，而只有消耗沒有生產的太太沒有好感，這是千眞萬確的。搞不好，就要把性命「清算」掉。對於低級公務員則以不了而了之。司法處的審判長沈佩玉是潛山人。他已五六十歲了，是跛一隻脚的人。他在六安工作六年，被俘的第二天，在民衆大會上，他被共軍用抬子（可以走）抬到大會上，當衆向民衆詢問沈某在任職期間，可有不法行爲。民衆都據實異口同聲的說他是個守本份的好司法官，共產黨人對他也就更加敬愛。也很多有老百姓在大會告他所屬的其他法官的，共產黨人也就當衆說當法官執行法時，自然難免得一面失一面了。那些被告的法官。當初被檢舉時，臉都青了，以爲性命難保，後來看看又不怎樣對付他，並且很能了解假的向老百姓們代爲辯護解釋，心中又高興，又感激。這一感激，眞是非同小可。也可以說是感同再造。現在他們都安然的出來了，向他們所熟識的人，都據實的報導了一番。共產黨的工作人員眞高明。他們曉得殺了這批不起作用的人，不但得不到收獲、反而給人們增加了對他們的恐怖。他們這樣的優待了俘擄，又好好開釋送出他們，他們出來了，雖然是照實話向別人談他這次被俘開釋的經過，這豈不是訓練了一批義務的宣傳者嗎？

六安損失

其次我談談六安破城後損失的情形。聯合社已經有了一個簡單的電訊，將六安軍火庫損失消息向外發佈了。六安的損失究有多大？是不是光是火藥庫損失呢？損失的詳情當然不是親歷其境的人所能知道的。全省保安司令部修械所就在六安，也是全省惟一規模宏大的修械所。聽說可以自製輕械機槍。因爲汽車運軍隊太忙，車輛太少，搬不出，所以修械所內全部機器槍彈都丟了。槍丟了約二萬多枝，並沒有美聯社發的電訊上所說的十五萬枝那樣多。其中有的是很好的槍，有些是正在修理中，有些還沒有修理。有些是從前學生在安慶集訓時用的破槍，根本就無法修理的。火藥的損失，聽說供應局有個火藥庫在那裏，詳細儲存數字，因爲具有祕密性，局外人也不便打聽，所以也就無法知道。六安糧食倉庫共有八個，均分散在城內和城郊五里以內的祠堂廟宇內，數字每個倉庫儲存量約在二十萬斤左右，八個倉庫存糧約在一百九十多萬斤。共軍進城後，首先就將倉庫、火藥庫、修械所，派重兵佔領了。三日由六安出兵將霍山佔據。立煌是八月三十一日失守的。故在六安失陷後的第二天即連天加夜的收六安的火藥、修械機器、糧食大部起運往霍山立煌山中。此時劉伯誠的總司令部設在霍山。剩下一小部份運不走的米糧，一部在城內和城箱，放賑似的任意叫民衆搬去吃。所以有壯丁的人家吃香了，有的家裏弄有三十多石的也有，三石五石的也有。老百姓這下可發了財了，平時沒有錢買米的人，這下可解決了。因此都相對發出衷心的歡笑。

六安醫藥及醫藥器材的損失，也非同小可。但是這樣損失統統是公家的。至於說到私人的損失，有權勢的人的東西，自有兵伕給搬運。陳漢流是縣長，他除了鍋碗盤碟及草紙沒有帶出來外，就是一件汗衫一條短褲也都有人給他運出來了。公家的槍損失了幾百枝（自衛隊用的），而他自己私有的兩挺輕機槍及四隻手槍則都分別運到合肥和蚌埠了。

霍山攻陷

三日晚，共軍又將霍山攻陷。在二日那天，霍山縣長諶裕因慣斂財，自知平時與地方父老及議會感情相處極惡劣，他見八月三十日立煌失了。霍山已成朝不保夕之勢，故在二日將縣自衛隊四個中隊，留二中隊守城，他自帶了兩個中隊託辭向西到立霍邊境去堵擊「匪軍」護保霍山之安全，實則他帶了兩個中隊，一直朝北，向六安來了。他滿以爲六安是個安全地帶。不湊巧的很，六安已於二日失去了。陷六安的共軍，亦派出一股向蘇家埠麻埠一帶搜

[illegible]前進。在[illegible]正着，打了半小時。譚某係一文弱書生，那里見得打仗？一聽槍響，就換上便衣，丢了隊伍，向編僻的荒山中逃走。自衛隊的兵見縣長都跑了，也都撤退的撤退，跑散的跑散。後來譚某跑到巢縣，以電話報告全省保安副司令張湘澤說：他在霍山和「匪軍」如何發生激戰，如何以少數的兵力去打擊來攻城的共軍，最後彈盡援絕，迫不得已作有計劃之撤出，但公家槍枝全部損失淨盡，僅余一人以身倖免，並說身上攜帶的款子二千多萬也在激戰中丢掉，我現在已脫離危險，到了巢縣，明天擬赴合肥面報霍山戰役詳情，請副司令先代向李主席（品仙）報告。張湘澤接到電話後，當立即同示囑以從速返回霍山縣境，收拾縣自衛隊，並在縣境內擇一合適地方恢復政權。譚裕接到電報後，以上面對他有意責難，不但不將他底戰功加以表揚嘉許，反而令其回縣，頗表不滿，在盛怒下就走到蕪湖去了。過了兩天，氣漸漸地平了，想想不對，霍山縣長老蹲在蕪湖也不算事。在六日隻身來到合肥，到張湘澤公館報告他不能回縣去的理由。張乃囑其回縣。伊乃苦苦請求，張以霍係廣西人，且在職責上言，亦未便強令其回縣，當將到合肥的實情電話報告李主席。李品仙接到電話後，大發雷霆，要張將其扣押。譚聽了李品仙要扣押他底電話，也就不敢再囉嗦，就輕輕地走出了張公館，向民政廳廳長黃同仇（黃亦係廣西人）報告霍山失陷的實況，實在沒有辦法回去，並當面遞了一紙辭呈。黃廳長也就將他這辭呈轉給李品仙，並囑譚翌日離合肥，避避風頭。李品仙看到了譚的辭呈後，雖然很生氣，結果還是親為親，鄰為鄰，拿起筆來批了照准了事。現在霍山的地方人及參議會對譚裕不能負守土之責，深為憤恨。至於擅自將自衛武力帶到六安境，為了保護私人出走，而將兩中隊人槍散失遣盡，及丢掉的款子，一概不予承認，聲言無論如何要他賠償。就在六日這天，六安縣長陳漢流也跑到合肥了，當面也向李品仙報告他在六安的戰功。李主席以陳是廣西派中在安徽的一個得力的幹部和人才，六安的一切損失，也就不加追究，並令建設廳重新撥了一個無線電台給他，（原有的電台丢了）叫他趕快去六安北鄉上任去了。陳漢流離開縣境五天，國軍由正陽關增援到六安的四十八師在麒頭集一帶，因軍事需要，征集民伕，又找不到地方行政人員，老百姓在軍隊暴怒之下，槍殺掉的不知有多少。

立煌戰役

立煌是在八月三十日失陷的。二十九日商城之共軍第三縱隊約二萬餘人，由立煌西河跡嶺偷襲立煌。立煌雖有山地，有險可守，有塞可扼，但在叢山峻嶺中，防務僅有國軍一八八旅之陳鐵漢團長率兵兩營，保安四總隊一大隊，連同縣地方自衛武力，總計不到五營人。陳團長及保安隊程大隊長分別守金家寨以南高山，立煌縣長李宣率縣自衛隊死守舊省政府及中山紀念堂一帶山地。金家寨（即立煌）打了一天就失了，而他們守軍也就連夜的各別被孤立起來，失去了聯絡，受了兩萬多的共軍重重包圍。血戰也就開始了，血戰一晝夜後，共軍勸他們投降。但是守軍的士氣很旺盛，不但不投降，反而給共軍以打擊。這時共軍已經圍攻而傷亡的有千多人，看到說降不成，乃開始以密集砲火射擊，破壞守軍的工事。立煌之包公祠，石榴場一帶房屋，悉在砲火中焚燒坍塌盡淨。這時立煌守軍抵抗力越發堅強，戰況慘烈，造成大別山戰役中空前紀錄，往來衝鋒，短兵相接，互相肉搏，陣地失而復得者數次，戰鬥達三晝夜之久，卒因衆寡懸殊，補給來源中斷，彈盡援絕，陳團長李縣長宣均於是役殉難。陳團長是陸大學生，守在碉堡上血戰到最後一人，猶不肯降。在未死以前還打死攻碉堡的共軍七人之多。共軍當問他是誰，他說他是「陳團」，「長」字還沒講出就飲彈氣絕；這是陳的一個傳達逃出來時說的。李宣被共軍生俘，後在民衆大會上當場被清算鬥爭掉了。這場戰爭，守軍五營幸免於死難者，數人而已。共軍也死了官兵三千多人，傷的還不在內。現在省府對負責守土的李縣長為沒有什麼特別撫卹優待的表示，而六安、霍山聞風就跑的兩個縣長也沒有什麼處罰，一般人對這事都表不滿。

共軍現在已在六安、霍山，舒城交界之毛坦廠山中掛起了六、霍、舒聯合民主政府的招牌。這個聯合民主政府裏的政治人員已在那裏開始做撫集民衆及宣傳他們的布爾塞維克主義了。立煌大山中的修械所也設立了，劉伯承也在這裏召集了一次邊區幹部會議，決議了幾個案子：一、從速在大別山中建立皖中軍區及游擊根據地。二、不攻堅、不爭點，而要不懈的爭取點以外的廣大的面。城鎮的得失，不應認爲是件値得或喜或憂的事。三、離間民衆與國民黨獨裁政府間之感情，以爭取羣衆。四、廣收智識份子，施以訓練，以儲備下級幹部人才。五、切實優待俘擄，尤其是被俘的公務員，施以短期訓練後，聽其去留，去者能發給遣散費，以減少戰爭中之阻力，並可促成國民黨政府之從速崩潰瓦解。這是大別山戰役中一斷柔和的插曲。共軍眞的能將這些決議案實施，那安徽就要變成第二個山東了。

合肥城防

六安，霍山相繼失陷後，舒城也於九月八日在一槍不放的情形下送給了共軍。假使共軍在佔領六安後，只須以二三千人直奔合肥，合肥也會無抵抗地讓他們到了城下。第八綏靖區司令官夏威二日親率警衛營兩連到合肥。到達合肥時是正午十二時，就是在這個時候六安失守的。夏威本來預備前進到六安設指揮所，調遣各路大軍追剿共軍的，但到了合肥，茶還沒有喝進口，六安失守的情報就送到他面前了。他急的兩手抓頭，默然無語良久。他曉得打仗就是打時間，由正陽關增防到六安的部隊較共軍遲了二小時，結果被阻於六安北二十鋪。他急的還不在此，而是合肥城防空虛手邊又沒有軍隊供調遣增防合肥。此時大軍多散在商城、潢川、固始、光山、葉集一帶，由正陽關到六安北面的，也只一團人。六安當時共軍卻有五個團，相形之下，兵力太單薄了。合肥城防只有保安團一團，另夏威警衛營兩連人。從三日到八日共六天，這六天當中一直沒有一人一馬來合肥。合肥的存亡，只好聽天由命。合肥的官方（政府方面）和軍方部是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熬煎着來度這驚慌的日子。爲適應機宜，也奉命組織成立了一個城防司令部。當時，合肥防禦任務，國防部給他們分配的很妥當：安徽整個大局的指揮，由夏司令官負責。合肥城防由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張湘澤兼司令負責死守，（與城池共存亡）。城防司令部下設新聞室、參謀室、副官室、及防奸、徵集（征集構築城防工事各項材料，及軍需糧食馬乾、消防、救護、和築城（建築城防工事）五組，另外還組織了一隊及齡壯丁的義勇警察隊，協助各組辦理未盡事項。這些時成立的機構──城防司令部──很快的展開了各個部門的工作。劉伯承到了現在，再想合肥，實在是件難事。合肥城外建有坑道工事，城腳建有城腳堡，城頭建有城頭堡，其他機構掩體，砲兵陣地，城頭指揮所，散兵坑，都用石灰磚及三和土砌成的

夾在鋸齒間的皖中

史　丹

（觀察皖中通信）由於山東戰局的演變，安徽成爲共軍竄襲的尾閭，一向不大被人注意的安徽局面，因爲皖中皖南觸目驚心的戰訊，立刻顯出了她的重要。

共軍竄入安徽的隊伍並不多，原來盤踞山中的人數也有限，何以在很短的時間內，能夠掀起這樣巨大的波瀾，要明瞭這個問題，首先要知道共軍未到以前的安徽究竟是什麼情形，地方政府在做些甚麼，老百姓在怎樣過活？

像其他許多省份一樣，安徽的農村危機，因爲動員而更深刻了，對於這，久居市塵的人，還是生疏的，即使偶爾有機會，登高極目，看到農村的外貌，平原無際，碧波千頃，也許情不自禁地要贊賞鄉居的恬靜幽逸。但是眞正的農村，卻不如閒情逸志的詩懷所欣賞的那樣令人嚮往，而是遍地塗抹着血腥和災難。有辦法的人，大批地流向都市，不安份的人淪爲匪盜；剩下的是大多數被生活綑在土地上的善良的人民，在土匪的日綁夜架酷吏的橫征暴斂裏，熬着多難的時日。

魚米之鄉　淪爲匪區

安徽是一個並不貧脊的省份，近兩年又算得上豐收，皖北因爲地質較差，一向又是兵戎角逐之地，固當別論，皖南平平可過。皖中則是溪河縱貫，平原沃野，不失爲一個魚米之鄉。而今天，就在這個區域，大別山成爲共軍的大本營，有新四軍，也有土匪。沿着大別山，立煌、岳西、潛山、太湖、宿松、望江、桐城、懷寧、都淪爲共軍和土匪四出騷擾之區，其中尤以桐城、潛山爲最。

共軍和土匪是有分別的，但是因爲土匪常常借着新四軍的名義肆行搶劫，所以往往容易被人混爲一談。大抵新四軍鄉人稱之爲四老爺，在談話時，爲着謹愼起見，常伸出四指代表稱謂。比較起來，新四軍聲勢浩大，武備齊全。出動時，常在百人以上；土匪剛剛相反，就搶劫的對象言，新四軍偏在中農以上，土匪則大小不論，出山一趟，只要有財可圖，不致落空，任何人都可以成爲對象。至於搶劫的手段，大抵都是一樣——綁票和丟票。

綁票・丟票　草木皆兵

所謂綁票，就是夜間破門而入，將一家最重要的人架走，藏之深山，然後勒索巨款。通常總是架走十餘齡的男孩，尤其是獨子。留下能掌家庭經濟大權的家主。這是一個極巧妙的安排，因爲在中國的社會裏，似乎只有男子只負有傳宗接代的任務，一旦失去，自然令人倍感焦灼，而留着家主，

。城牆殘破的缺口，也連天加夜的在三、四兩日補好。合肥的城防工事已建築了十分之九，這些工事都是永久的，而非野戰工事。

大官與人心

合肥的老百姓都因爲夏威坐鎭此間，人心比較安定。可是省府一般官員們總是感到合肥的威脅並未因之減輕，危機也一天天的在加重。大官們終是喘喘不安。五日，李品仙主席手令蕪湖楊專員將江面所有大小船隻統統加以控制，並將江面交通封鎖。巢湖水警察總隊也同時接到同樣命令，將巢湖內所有船隻扣留，以備使用。七日那天，城內仍不見增援部隊到達，李品仙夫人羅嘯如再也沉不住氣了。就將公館裏所有細軟東西，結紮停當，在一大清早，由羅嘯如親自押車，裝了重達二噸半的美國大卡車五車出城，到蚌埠去待命前進京滬了。夏威對這事極表不滿，當即以電話通知其在蚌小南山公館里的太太，要她乘李夫人去蚌的原車來合。這雖然有礙給李品仙難堪，好在李的豁達大度，氣量寬宏，也不以爲意。省府祕書長蘇民，民政廳長黃同仇，及其他一些達官貴人也都緊起效法，開始要各夫人押運東西到蚌埠轉車京滬去了。蘇民因爲東西帶走的太多，到了水家湖轉車時，丟了兩箱沒有轉運。等到蚌埠檢查行李時，少了兩號，才知道掉了，可見走時慌慌的程度。合肥城內都謠言黃同仇帶了光是現鈔就有十五億，實情是否如此，外人無從對證稽考。但停在黃的公館門前的三輛大卡車都裝得滿滿卻是事實。

省府在他們這些大人走後，一些小公務員每天也都沒有精神辦公了，因爲他們都說大人先生們比我們官大有權勢，但命和我們總是一樣，他們都把太太送走了，我們沒有錢，走不動，我們還辦啥公。李品仙見了這情形，雖然在朝會上大發了一頓裝模作樣的脾氣，也沒有人聽他的，因爲他底太太到底是走了，他的理由他自己也曉得，所以來了個緊急措施，每人發給兩月薪水，給每人疏散眷屬。有了眷屬的，領了兩月薪水一百多萬，還是走不動，且出了城五里，就有被土匪搶走的可能，大家都覺得於其死在洋溝里，倒不如死在大海里好。結果走的人，百無一二。沒有眷屬的人，領了錢，當天晚上，對牌九桌上一坐，牌九桌邊一站，剎那的工夫都就輸光了。現在沒有錢剃頭及繳伙食費的人多的很。

合肥在九月十日以前，薦任官以上的太太們都分別找關係得到了車票船票走光了，當時留在合肥沒有走的，僅只有張湘澤的夫人一人。她本人始終堅絕表示不願走，願意跟他的丈夫和城共存亡。

八日舒城失守，當晚追抵合肥南桃溪鎭。保安團一團兵苦力支持了兩天兩夜，共軍在這裏死傷在八百人以上。十一日夜共軍增加兩團，將保安團團團包圍起來。保安團受砲火壓力，不支，在十一日拂曉衝出重圍，死傷大半，退到花子崗、董崗（距合肥五十里）、後五十里舖，合肥這時認眞的進入了混亂和緊張的情態中。這時幸而援軍一八八師趕到，董崗、五十里舖，保安團因國軍到達，即奉命撤退下來。那知國軍一八八師故意留難，不予放行。保安團說：子彈打完了，兵也散了，奉命退下來收容散兵和整訓的。國軍一定要給他們子彈叫他們再上前線，去給他們打頭陣。保安團不肯，就在這時，一八八師就將退下來的五十六個保安團官兵集合起來，繳了械後，就用機槍掃射完了。這個局面，眞是慘絕人寰。事後，夏威知道了，一八八師也知道不妙，把那位主事的副團長及四個排長一齊扣押，解交第八綏靖區司令部。現在綏區司令部已從蚌埠調來了兩位軍法官，正在審訊中。到底這案子怎樣辦，還無從知曉。

現在皖省戰事就是告一段落了。宿松、太湖、霍山、廬江、無爲、桐城、舒城、六安、潛山、立煌、固始、霍川、光山、英山、羅田、浠水、正陽、臨泉、太和、阜陽、渦陽、蒙城、壽縣等縣城，均次第收復。目前陳毅部又南下，配合土共魏鳳樓，金少三部在鹿邑、柘城一帶。劉伯承五個團又在三河尖修搭浮橋，企圖夾擊阜陽，迎接陳部再進大別山。

正好爲之張羅款目，設法營救。贖人的身價，大得驚人，不僅使鄉下人不堪負担，就是都市巨富亦感到數字太龐大。筆者的一個族人被綁，因爲吝於出錢，被擊斃路旁。一個小地主的獨子被架，討價兩億，弄得他奔走求援，賣田鬻宅，足足忙了一月有餘，只湊上半數，央求再至，才贖出人來。自此兩手空空，只有依人爲生了。前不久，因爲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遇見這一對劫後餘生的父子，談起他們的遭遇，還是嗟嘆不已。據說：山裏的人並不多，可是對於鄉間居戶的家財事務都調査得巨細無遺。對於要下手的人戶，何日做米，何日出售，進款若干，都打聽得絲毫不差，使你根本無法隱瞞。在被綁者釋放之前，要一再受到他們的警告，不許洩露內中實情，否則立時施以報復！至今已經事隔兩月，父子俱成光桿，提起此事，還是驚魂未定，欲語又止。另外一個木料商人，因爲聽說有不相識的人打聽他的住址，倉皇出走，一日夜翻山越嶺，跑了一百多里，在一個遠親那裏躲避，關心他的朋友特地趕來問訊，他竟認爲是匪人的偵探，急急又往後門溜走，親朋相疑，一至如此，草木皆兵的情景，不難由此想見了。

富者的遭遇，固然是這樣，就連普通人戶，有一頭耕牛或是某日小有進款，雖能倖免於四老爺，也放不過土匪的手！這正是「遠賊必有近跡」左隣右舍，誰敢保證無人通匪呢？

至於丟票，那是因爲綁票已著成效，無須綁架之勞，只要於夜深人靜時丟一張注明錢數的額票，收票的人就得乖乖地設法奉納，以免更壞的遭遇。俗諺所謂：「開門七件事，柴、米、油、鹽、醬、醋、茶」，現在可加上一件更重要的事了，關門第一件，便是互詢昨夜何處被搶，如果一夜不聞搶聲，那眞是天大的例外了。

夜有土匪　日有地保

夜間是土匪的世界，白天呢，當然是保甲的天下了。「保長進門，兩眼釘神，不是要錢，便是要人。」這抗戰時期曾經流行的現象，現在一直變本加厲地繼續了下來。在動員徵兵急如星火的情形下，強徵硬拉，固是司空見慣；收買壯丁，尤其是公開的事實。在保長主持下，挨戶索費，買人充額，即使在較大的城市如安慶也一樣地公開進行，因此就有職業壯丁的出現，這些人都是老軍游子，機警狡詐，不待上陣，便逃之夭夭，回來後，又復重執舊業，得錢頂替。反正保長是老來往，利惠互通，大家得安，有什麼不受歡迎呢！倘若還有人不知道動員的效力的話，從這裏，你就不難懂得了。

縣官爲政　不出公門

老百姓在吏匪交榨中討着生活，我們的父母官呢？君臨一方，爲政不出公門，一切是「人事第一」，只要周旋於議員縉紳之間，應付得體，就能安居廟堂，而地方紳縉也樂於交接官府，互張聲勢。況且在大選風雨欲來的時會，組織社團，忙請客拉票之不暇，遑及爲民請命？于是對於治安兵事，遂養成「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的大度和忍耐。所謂維持治安，改良鄉政，公函文告，自是冠冕堂皇，不乏動人之筆，而見之行事的，卻百不有一。

新聞報導　諱莫如深

報紙上對於地方搶殺的新聞，是不容易見到的，充斥紙面的都是會議記錄和要人演詞，只有從外地的報紙上可能發現一些零星的報導。因此，眞正能得到消息的，還是老百姓。桐懷之間的高河埠附近，早在一個多月以前，就有人發現共軍住紮，人數約有兩連，便衣放哨，盤査行人。並且召集當地人談話說：來此任務是剿滅假冒新四軍名義行刧的土匪，負責當地治安，請大家放心。老百姓且疑且懼地聽了這些話，連私下交換意見都不敢，可是歷久不見騷動，也就漸漸信以爲眞了。

未剿匪窩　先清民「巢」

對於這些消息，縣府專署不是毫無所聞，間或亦有清剿的壯舉。但是，自衛隊下鄉，三五十人一行，每到一村，先要殺豬宰雞，接受犒勞，酒醉飯飽，然後放他搶，老百姓以爲匪到戰起，相率走避，於是這些「官兵」便乘機搜索，四入民家，一掃而空，眞是清「巢」而去，比起土匪實在要徹底多了！我親自聽到許多老百姓說：「我們寧願土匪綁票，不願自衛隊清剿」，事實表現如此，誰能說老百姓厚於「匪軍」，薄於「官兵」呢？

平時既然如此，應變倉皇，自是勢所必然。月初，當劉伯承部由山東結隊入竄，猝不及防，立（煌）霍（山）告陷，桐潛不守，作爲長江交通孔道的安慶，立時緊張起來。其實，首先着慌的倒不是老百姓，而是機關。譬如安慶四牌樓的商業區，起初仍然照常營業，但孝肅路吳樾街一帶，因爲縣府和高院的職員均傢俱紛紛藏入民家，騷亂和不安[illegible]由是傳播出去。城之不守，復何傢俱可有，其人心計何出，令人百思不解！

老百姓夾在鋸齒裏！

現在皖中國軍與共軍已經眞正地接觸了，據報載：立、霍、桐、潛、相繼克復，共軍已被逼入走山區，安合兩地防務也有把握。就表面看，除非共軍增調人馬，否則是不易得逞的。可是就這點力量，加上官的政治工作已經不容低估了。況且皖淪又併上了！你來我去，勢成拉鋸，夾在鋸齒間的老百姓可眞受不了啊！

「先生，可還有什麼和解的希望沒有？」我還不時聽到這樣令人不忍回答的問話，聲音是如此淒涼和渺茫！希望，希望在那裏呢？從那些消瘦多縐面孔上，我看到多少中國農民的辛酸史蹟！也只有中國人民才有這樣的忍耐，他們，除了用眼淚和嘆息默默地承受一切災難和不幸外，更會有什麼呢？但是，他們能永遠這樣嗎？

代郵

一

各位託我們轉信給留美八位同學的讀者先生：你們的信，我們隨收隨轉，一一寄出，即請釋念。我們爲了節省時間，所以不再另復，謹請原諒。我們希望留美八位同學收到諸位的信件後，都有回信給你們。但其中一部分回信，可能要晚一點。或須于一個月後始能收到。（編者）

二

綏遠五原信伯仙先生：示悉。梁漱溟先生所著「鄉村建設理論」，上海河南路三二八號利羣書報發行所有售，每冊定價二萬八仟元，郵費在外（約三千元左右）。此復。（編者）

提高稿費（第九次調整）

啓者：本刊稿費，自十月十六日起，每千字致奉國幣六萬至八萬元。此啓

北平學生被捕被釋記

觀察特約記者

（觀察北平通信）九月三十日的早晨，也是中秋節後的一天，沉寂已久的北大民主牆上，又發現了一個不署名的大佈告，上書「本校力易周、邢福津、吳謨三同學已失蹤數日，一定是被捕了」等字。失蹤的既有有姓，加以連日入夜以後，街頭巷尾又施行嚴密檢查，於是這消息立即引起了廣泛的注意。接着確定性的消息傳了出來，說他們三人確已被捕：其中邢福津是在一個朋友家聊天的時候被闖進來的便衣架走的；力易周是被特務用假信說有朋友請客騙出學校，在途中被捕的；吳謨是在檢查時被帶走的。接着又傳清華有陳彰遠被捕，燕大有鄭理康被捕。這五件事發生的時間都在九月二十六七兩天的傍晚，地點都在校外。胡適校長聞訊，即函詢市黨部，市黨部加以否認，但不久就在行轅得到了證實，也從行轅得到了一個消息：「還沒有到入校逮捕的時候」。但這話並不是慰藉。

是不是這五個學生會被輕易釋放呢？這是教授學生當時焦慮的問題。據他們的分析，未必容易。他們推定這是一件必然的事，這是一個有計劃的行動，因爲這次逮捕的決不止這五個學生（據聞陳布雷的女公子也被捕），市面上又傳說這是一個開始，中外出版社又被封閉。更重要的，還是官方強硬的態度，何思源市長與陳繼承警備總司令對中央社記者發表的談話，也登在這一天（三十日）的報上，其原文如次：

「共黨割據地方，興兵稱亂，政府屢加容忍，無非欲其悔悟，使民難稍蘇，徐圖國家建設。乃共黨不惟不知改悔，反擴大叛亂，除在各地發動騷擾外，更利用黨徒，潛入後方各處，興謠蠱惑，暴動放火，刺探軍情，製造混亂，爲害之烈，甚於洪水猛獸。我政府不忍坐視各地民衆陷於水深火熱，決心於短期內戡平叛亂，爲使受匪徒脅迫盲目相從之輩，獲得自新機會，毅然頒行『後方共黨處置辦法』，對失足後亟思自拔誠意歸順者，予以自新之路。北平爲文化城市，亦華北政治中心，夙爲共匪活動目標，潛伏共黨，當非少數。茲特鄭重公告：本辦法業經公佈施行，本人等負地方治安之責，絕對嚴格執行，切實辦理，希望誤入迷途者，從速猛醒，自當本政府脅從罔治之旨，予以自新機會，如再執迷不悟，爲虎作倀，自當依法逮捕，從嚴懲處，決不使一人漏網，期能配合前方軍事，使共匪早日肅清，完成戡亂建國工作」。

救人如救火，主要的工作在要求及早釋放這五個學生。爲此，燕大於十月一日罷課一天，清華北大也有同樣的醞釀。不過，北大的罷課附有條件，就是如果在十月二日下午八時以前還五個人還不放出，就將行罷課，在這段決定罷課而尚未執行的期間，請胡校長向行轅交涉。胡校長在二月間王憲銓事件發生後，曾允諾北大學生：決不讓特務打進學校來，如果有人抓去了，他決立即保出來。現在是胡校長實行諾言的時候了，學生們又苦苦要求，教授們也覺得只有胡校長能負也應該負這種責任。因之胡校長不遺餘力的奔走，加上教授學生的堅持，這五個學生終於十月一日午後六時全部釋放了。這以後，又傳北大二年級學生孟憲功被捕，也可能同樣保出來。

現在，被捕的總算重獲自由了。被捕者之一告訴記者：他被捕後，由一輛小包車飛快的送至景山東街刑警大隊，再轉送至北城一個頂偏僻的地方，住的是一間小小的房子，由兩個小孔裏透進絲絲的光線來。房子裏擺一張地舖，對面便是一個小坑，小便大便都在那裏。吃的更苦了，每遇開飯時，由小孔裏塞進一碗頂壞頂壞的米飯，沒有菜，也不給筷子。他在獄中，未被訊問，出獄時，也未叫他寫「悔過書」之類，只在被捕時，聽得說一句：「奉令要逮捕你」。不過，在他們釋放後，行轅終於宣佈了他們的罪名；在十月二日中央社有行轅的一段話云：

「因該五生等於日前赴最近在平市被破獲之共匪秘密機關探訪被捕人員，或領取款項，經該處留守人員詰詢後，以涉嫌當予扣留，即時移送北平警備司令部，除情節較重者外，已通知各校當局先行保釋，聽候偵訊法辦」。

關於二日中央社這個的消息，吳謨、力易周、邢福津聲明三點：一、他們是在訪友途中被捕，非赴某「共黨秘密機關」；二、所謂「領取款項」更是無中生有；三、他們出來時是「無罪開釋」，有關當局並客氣地向他們表示這是誤會。胡校長擬將這聲明轉請中央社更正，胡校長並表示這次逮捕「恐係誤會」，「偵訊法辦」「不過是一套例行術語。

（十月三日）

歡迎定閱

蚌埠緊張

（上接第二頁）

從山東越隴海綫而入蘇皖的共軍陳毅部，於九月三十日陷津浦綫的夾溝、符離集、圍攻宿縣。蚌徐間交通突斷，蚌埠人心惶惶不可終日。達官貴顯，莫不攜眷紛紛南遷，整個蚌埠陷於極度紊亂的狀態。機關、商店，辦理結束，而銀行錢莊，提款的人紛至沓來。偏偏銀根奇緊，尤其錢莊，放出的款子無法收回，提款的人又鎮日不肯離去。金融市場的混亂，達於極點。不得已，始有十月二日的「緊急會議穩定金融臨時辦法」的頒佈。

火車站上擠得水洩不通，大小的吉普車，滿載着大小皮箱、行囊，以及花枝招展的太太們，絡繹不絕駛向車站。很少看見他（她）們持票進站，檢票員祇是專檢查老百姓的票。

駐蚌各級機關亦都部份遷走，直接稅局竟公然每人發十五萬元遣散費，遣散職員了。

在剛勝利的時候，蚌埠曾一度被共軍攻到市郊的老虎山麓。當時民氣是興奮的，激昂的，鎮靜的，雖然槍砲之聲，近在咫尺，市內的空氣依然安定如恆。可是今非昔比，現在，戰場雖遠在一百八十里外的宿縣，而已是滿城風雨，草木皆兵了。

適生　十月四日　蚌埠

擋不住·團不攏·共不起

編輯先生：政府的政令，多數不能下達民間，倒是黨團的摩擦，却深入到每一個角落了。無論那種選舉的打架，莫不是黨團在背後鬥法。老百姓關于黨團的戲，實在看得太多了，尤其是「挨戶強迫入團入黨」的招兵買馬，更傷盡了腦筋。老百姓對黨團的精神，已不待官方的宣傳，很有一番深刻而清楚的認識，可以在他們的口頭流行之一句很普通的話：——「黨（與擋同音）不住，團不攏，共不起」——眞是形容得淋漓盡致了。

何經沛　九月十三日　長沙

令人醉的詩和令人醒的詩

何達

「觀察」三卷一期刊朱自清先生「論朗誦詩」一文，內引拙作兩首：「我們開會」和「不怕死——怕討論」。朱先生文內曾提出兩種詩，一種詩適于「看」，一種詩適于「聽」。還說：朗誦詩是『一種聽的詩，是新詩中的新詩』。又說：『它活在行動裏，在行動裏完整，在行動裏完成。這也是朗誦詩之所以為新詩中的新詩』。朱先生這段話簡單扼要，十分清楚。這段話給我一個啓示，叫我想到從詩的功用上來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那就是令人醉的詩和令人醒的詩。

如果我們說，一種詩使人「醉」，一種詩使人「醒」，那麼前者，要的是「夠味兒」，「味兒」要玩，我們說「玩味」；後者要的是「夠勁兒」，「勁兒」要用，我們說「用勁」。顯然，朗誦詩之所以被某些人輕視，正因為它不是「玩味」的詩。玩味要有「閑」。朗誦詩，活在行動裏，它是屬于在「行動」着的人們的，它要「夠勁兒」，前一種詩，是可以「想」出來的。後一種詩，卻要「活」出來，要在「行動」中產生出來。

我們設想，如果一個人，自始至終和大家生活在一起，每天都在考慮着大家的事情，那麼他的每一句話，都可以，也都必要向大家說，他的每一陣輕微的情緒的激盪，都會與大家相通。他也渴望和大家相通。他一定盡所有的力量把他的語言，順利地尖銳地打入大家的心坎。如果他有藝術的才能，他必然創造出被大家所接受的所熱愛的所深受感動的藝術。

直到現在，朗誦詩還被某些人誤解，以為那只是粗淺的通俗易解的作品。事實上，通俗易解，只是朗誦詩起碼的條件，卻不是最高的水準。一個作者能夠用語言的拳頭，敲進聽眾的心坎，比單用只有自己或與自己嗜好相近的少數人所了解的符號紀錄下自己內心的波動的人，需要更豐富的知識與更辛勤的工作。應該面向着羣眾精神的大海，就得有很大的魄力，才能去那上面航行。羣眾是一片動盪不安的大海，朗誦詩的作者和朗誦詩者，至少得有一點航海的經驗和勇氣。這經驗與勇氣的大小，又看他與羣眾結合到如何親密的程度。歷史上並沒有幾個這樣的人物，沒有幾個這樣的人，能夠隨時隨地直挺挺地站在成千成萬的羣眾的前面，一言一語都能夠抓住聽眾的心弦，經得住羣眾的考驗，得到羣眾的信任與愛戴，能夠在任何艱難危險之下都不離開羣眾，他對羣眾發出的每一個聲音，都不軟弱，不模糊。

一個朗誦詩的作者，他必須隨時關懷着大眾的幸福與災害，否則他就不會在偶然的集會中喊出大家的要求，不會在突發事件中指出大家的道路，否則，他不可能經常地體認大眾的感情，組織這感情，發揮這感情，並且鍛鍊這感情，使它成為不可抗拒的力量。

寫「玩味」的詩，作者常常要找一個使自己陶醉的環境，在那種如狂似癡的氣氛裏，把自己的靈魂浸進去，好像把藥泡進酒裏去，然後自己再喝這杯酒，然後再用自己噴出來的酒氣去引別人沉醉。有時雖也不免「嘔心瀝血」，或「撚斷數根鬚」，但那都還是把力氣花在「寫」詩上，不是花在「生活」上。

寫後一種詩，卻須在生活裏生根，滋長，以至于成熟，就如聞一多先生所說的：『我們用生命去寫詩』。作者事先並沒有存寫詩的念頭，只是生活，行動，思想，受感動，下決心，然後又思考，又發現什麼，又有衝動，又受挫折，有時哭，有時笑，有時喊叫，有時和朋友爭吵，有時暴怒，有時痛恨，是的，有時要冒險，受誣蔑，然後又反省，又得到安慰和鼓勵，又有小成功，于是又希望，又鼓起勇氣，又提起熱情，又再聽，再看，再思想，……然後詩來了，是「湧」來的。這些詩，看起來往往沒有所謂「技巧」，卻行行是血肉，字字是真實，在千萬人的耳裏轟鳴，在千萬人的心上開花，在千萬人的骨髓裏填滿生命的炸藥。

這些詩，就是朱先生所謂的「新詩裏的新詩」，「不像我們有過的那些詩」。這種詩並不多，因而好的也更少。今天中國寫詩的人，大部還沒有養成一套生活習慣，還沒有把自己沒有保留地投進「行動」裏燃燒，鍛鍊，還沒有隨時隨地都面向着成千成萬的人思想，或者說「出聲的思想」，還不太習慣用「我們」這個字，還不太習慣于「羣眾」的場合。

然而，「新又生新」，新詩裏又產生出新詩來，慧眼人應該從這裏看出一點新機，看出一點「未來」的消息。看出一點真正的「新詩」和「新詩人」的受孕。聞一多先生生前曾說，過去的詩人，對社會抱着旁觀的態度，今天的詩人，應該身先士卒，是人民的旗手。像聞一多先生這樣把自己毫無保留地獻身社會，才是真正詩人所具有的「至情」，他的聲音，才是昭示萬世的「至理」。

今天，大地在翻身，樹根草皮在翻轉，千丈高樓碎成齏粉，潛在的壓抑着的生命的海奔騰洶湧地「醒」轉來，那些「善醉」「能夢」的「詩人」們將「朦朧」而「烟化」，迷離惝恍，超凡，脫俗，而不知所終吧。

我們看見，在這激流一般的時代，每一個「醒」來的「行動」的人都容光煥發，每一個逃避責任的人，都帶着一雙不安猶豫，『無可奈何』的眼睛。在這時代的洪流裏，個人的存亡，詩的有無，都無關重要。然而只要人還活着，作為一個真正的「人」活着，他必然是一個對現秩序的「抗議者」，一個響亮的聲音，必然是戰鬥的聲音同樣，只要詩還存在，還被寫作，被朗誦，它必然是「沉重，粗獷，倔强而嚇人！」。

一九四七年九月九日

附註：朱先生所引拙作「我們開會」，第三行「像車輻」，誤刊為「像車輪」，附此更正。

（上接廿四頁）第二小時專門用來討論分析與發問；主講人應該包括本校的他校的和政府中社會上對某一問題有特別研究或見解的人；應該由校長指定教授中之三人或五人組織一個委員會負責主持；應該：題目預先編排，只有遇到大事件發生時才可以更動；時事範圍應該不只限於政治和經濟，更應該包括自然科學、醫學、工程，以及文哲史地（史地是研究新聞的根本）；應該以學生上課之勤或惰，筆記之清楚或拉雜，發言之有條理或無倫次，報告之有見地或無頭腦作為判定分數的根據；應該由學校指定專人剪報並搜集和集中資料。最後，應該讓學生在課堂上任意發表意見，絕不可因態度激昂或思想前進便會影響他的學業或安全。這是最重要的一項，因為必須獲得這項保障，學生才敢放膽發言，這門功課才不算白設。

本年秋季開始，浙大就想先開設一門「世界文化」，這是該校向這個方向走的一步。離秋季始業已在不遠，我更願以上面的一點拙見，貢獻於各校當軸諸先生之前。

書評

國家與道德

吳恩裕

States and Morals

A Study in Political Conflicts

By T. D. Weldon

John Murray 出版（倫敦 1946）

英國當代的政治思想界，如以地域學校來分，顯然有三個重鎮。一個是牛津，另一個是劍橋，第三個是倫敦。劍橋比較勢力單薄，因爲它唯一的政治思想教授 E. Barker 已經退休到牛津去做名譽院士(fellow)去了。他大是牛津人，是導師(tutor)出身的。他是H. J. Laski 教授的先生。他由牛津，而倫敦（在 Kings College），而劍橋，最後又回到老家牛津養老。這位老先生在一九四六年出版的一本Reflections on Government 書的序上曾打趣地說：劍橋和牛津我都呆了很久，但是我最喜歡那一個呢？這件事却只有讓它做爲我國人心裏的一個祕密了！他離開劍橋之後，劍橋就已有後繼無人之變了。

倫敦治政治思想的學者，曾經極一時之盛。如 G. Wallas, T. H. Hobhouse, 等，都是過去極負盛名的人物。其後有 Laski 在那裏撑台，所以倫敦也是政治思想的中心。比較新進的如 Smellie, G. H. Wilson 也都是相當有希望的人物，但是他們却不和 Laski 同調。Smellie 旁及分析派哲學，其著作如Reason in Politics（1938），雖力求深刻，而惜未能。Wilson 則受德國唯心派的影響很深。

牛津從 Green, Bradley 時起，政治思想的傳統，就保持不歇。牛津的人大都相當切實。在導師制下。很有些頭腦清楚，學識豐富的導師和院士。過去的如 D. G. Ritchie，現在的如Carritt, R. H. S. Crossman, T. D. Weldon, J. W. Gough等。至於G. D. H. Cole, A. D. Lindsay 那些老人物，更是早就爲大家公認的了。Barker 回到老家，當更增加一生力軍。在老人中，我覺得Lindsay 的 Modern Democratic States(1942) 代表一新的趨勢。這趨勢和牛津的唯心傳統相距很遠，和 Laski 這派論現實國家的思想接近。新人中，Carritt 的Morals and Politics（1935），早爲治政治學者所推重。他長於分析，讀書仔細，一點都不肯放鬆。又如 Crossman 的 Plato To-Day（1937）一書，也是既能充分利用歷史的材料，又具有歷史想像的佳著。數年前牛津教授 Dodds 到重慶時，曾向筆者推重這本書。但當時則並未得讀到，因爲 Dodds 教授所帶僅有的一本已被他贈給武漢大學了（孟雲橋先生在某期「哲學評論」上，曾有一書評）。去年筆者來北平，才得購閱。因知 Dodds 所言，並非過譽。最近則又有 Weldon 這本値得介紹的 States and Morals。

這本書有六章。第（一）章，政治哲學的目的，其中也論及政治哲學的方法，理性論與經驗論等。第（二）章，政治學說。主要的認爲解釋國家的政治學說有兩大派別。一派是有機說；另一派是機器說。在機器說中，又可分爲兩小派別。一個是說這機器的造成是以强力（force theory）；另一個是說用同意（Consent theory）造成的。著者對於這些派別的內容及涵義，在本章中，都有一般的介紹，並且指出它們的缺點。其中又有些表解，如以爲『有機說大概爲右派，爲法西斯主義者所根據；同意說大概爲析衷派，自由主義者所根據；强力說大概爲左派，共產主義者所根據』。但他却認爲：這種表解是危險的，因爲它並不能確切地代表事實。第（三）章，政治哲學家。前一章是總括地介紹上面所述三種對於國家的看法，本章舉政治思想的權威爲例，詳細分析其學說。代表有機說的，如亞里士多德，盧梭，黑格爾。代表以强力造成國家機器說的，如霍布士，馬克斯。代表以同意造成國家機器說的，如洛克。對於以上各家學說（當然不是普遍的，而是與本題有關的，此點著者曾有聲明），都有詳細的分析。第（四）章，理論中的國家與實際中的國家。探討是否現存的國家和第二三章所述之政治理論相符？其結論是：沒有一種國家學說是能和現存國家之所有一切事實相符的。第（五）章，政治與道德。討論政治學說多少有意根據的道德信念，並論及著者所認爲英、美政治學說所根據的幾種特別的道德觀點。第（六）章，實際問題。本章回答著者自己所提出的兩個問題：第一，政治理論，特別是民主的理論，是否適於傳播使之普及？第二，假如不適宜，那麼相信民主的國家，是否不可避免地，或者可能地，又許與非民主的國家，從事於思想形態的戰事（ideological war）？

本書的方法，顯然不是一個新的企圖：因爲由政治思想的性質與衝突，來推測世界政治的前途，固早已有之。本書用這種辦法，所得到的結論，筆者也不願意有所評騭，因爲『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儘管讓每個人採取他自己的方法，推得他自己的結論好了。無論如何，大家都是在對着這紛亂，動盪的世界，求認識，求解答，最後所以求解決之道。只要彼此態度都是嚴肅的，總會有相當的成果，並且都會有助於眞理的闡明，與事實的解決的。

筆者所要介紹的，是著者對於政治思想的分析，大體上頗爲精確，並且時有新解，足見其頭腦的細密。我們試舉幾個例證如下。

比如他講亞里士多德的：『人本性就是政治的動物』（"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這句話幾乎誰都知道。但要談了解，不但一般人不得其正解，即歷來亞里士多德的解釋者，也都沒有令人滿意的說法。如 MacIwain 的解釋，把「政治的」改成「社會的及政治的」動物云云（其實這乃是 Thomas Aquinas 的解釋），也覺得牽强。G. H. Sabine 把亞里士多德的「本性」解釋成「發展」("nature as development")，因此可以說：人，卽使生而非政治的動物，但在其發展的圓滿境界，則必爲政治的動物。此說法可謂深知亞里士多德所謂"nature"；乃是生物學上的意義，與自然科學上的意義不同。這也不足怪：因爲亞里士多德本來受生物學的影響很深。本書作者，則直截了當地認爲亞里士多德所謂"nature"：本來卽有兩種意義：一是"nature A"二是"nature B"：前者是事物（筆者按此當然指生物）的本然狀態；後者是事物的發展狀態。（頁七二至七八）這樣，則人卽使本然非政治的動物，但在其發展的圓滿狀態中，則可以，或必須，變成政治的動物。亦卽按人的"nature A"，他不是政治的動物；而按其"nature B"，他是政治的動物；亞里士多德所謂"nature"既兼有A，B二義，那麼："man is by nature a political animal"一句話，自然就易解了。此種地方，可見著者頭腦之細密。

此外，他講霍布士（頁一〇三至一一〇）而一般認爲 Leviathan 代表有機派之說（如迦納卽有此見解），講盧梭（頁七六至八六）而强調其自相矛盾之點，都有新見。而這種精闢的地方，在本書中到處可見。以篇幅關係，不多徵引。

研究政治思想最怕缺乏分析能力。博聞强記，也許可以做歷史家的鵠的；但是做爲一個政治思想家，如果祇對於前人成說，如數家珍，而不能加以分析釐清，那就可以說沒有多大希望。因此，分析清楚深刻的著作，也就十分難得。我特別向讀者推薦這本書的原因，也就正在這裏。

一九四七年九月四日北平，沙灘。

觀察文摘

爭取學術獨立的十年計畫

原作者：胡適
原刊處：獨立時論社社論

我很深切的感覺中國的高等教育應該有一個自覺的十年計畫，其目的是要在十年之中建立起中國學術獨立的基礎。

我說的「學術獨立」，當然不是一班守舊的人們心裏想的「漢家自有學術，何必遠法歐美」。我決不想中國今後的學術可以脫離現代世界的學術而自已尋出一條孤立的途徑。我也決不主張十年之後就可以沒有留學外國的中國學者了。

我所謂「學術獨立」必須具有四個條件：（一）世界現代學術的基本訓練，中國自己應該有大學可以充分担負，不必向國外去尋求。（二）受了基本訓練的人才，在國內應該有設備夠用與師資良好的地方，可以繼續做專門的科學研究。（三）本國需要解決的科學問題，工業問題，醫藥與公共衛生問題，國防工業問題等等，在國內都應該有適宜的專門人才與研究機構可以幫助社會國家尋求得解決。（四）對於現代世界的學術，本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應該和世界各國的學人與研究機關分工合作，共同担負人類學術進展的責任。

要做到這樣的學術獨立，我們必須及早準備一個良好的，堅實的基礎。所以我提議，中國此時應該有一個大學教育的十年計劃，在十年之內，集中國家的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成績最好的大學，使他們盡力發展他們的研究工作，使他們成為第一流的學術中心，使他們成為國家學術獨立的根據地。

這個十年計劃也可以分做兩個階段。第一個五年，先培植起五個大學。五年之後，再加上五個大學，這個分兩期的方法有幾種好處：第一，國家的人才與財力恐怕不夠同時發展十個第一流的大學。第二，先用國家力量培植五所大學，可以鼓勵其他大學努力向上，爭取第二期五個大學的地位。

我提議的十年計劃，當然不是只顧到那五個十個大學而不要那其餘的大學和學院了。說的詳細一點，我提議：

（一）政府應該下大決心，在十年之內，不再添設大學或獨立學院。

（二）本年憲法生效之後，政府必須嚴格實行憲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的規定：「教育文化科學之經費，在中央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十五，在省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廿五，在市縣不得少於其預算總額百分之三十五。」全國人民與人民團體應該隨時監督各級政府嚴格執行。

（三）政府應該有一個高等教育的十年計劃，分兩期施行。

（四）在第一個五年裏，挑選五個大學，用最大的力量培植他們，特別發展他們的研究所，使他們能在已有的基礎之上，在短期間內，發展成為現代學術的重要中心。

（五）在第二個五年裏，繼續培植前期五個大學之外，再挑選五個大學，用同樣的大力量培植他們，特別發展他們的研究所，使他們在短期內發展成為現代學術的重要中心。

（六）在這十年裏，對於其餘的四十多個國立大學和獨立學院，政府應該充分增加他們的經費，擴充他們的設備，使他們有繼續整頓發展的機會，使他們成為各地最好的大學。對於有成績的私立大學和獨立學院，政府也應該繼續民國二十二年以來補助私立學校的政策，給他們適當的補助費，使他們能繼續發展。

（七）在選擇每一期的五個大學之中，私立的學校與國立的學校應該有同樣被挑選的機會。選擇的標準應該注重人才，設備，研究成績。

（八）這個十年計劃應該包括整個大學教育制度的革新，也應該包括「大學」的觀念的根本改換，近年來所爭的幾個學院以上才可稱大學，簡直是無謂之爭。今後中國的大學教育應該朝着研究院的方向去發展。凡能訓練研究工作人才的，凡有教授與研究生做獨立的科學研究的，才是眞正的大學。凡只能完成四年本科教育的，儘管有十院七八十系，都不算是將來的最高學府。從這個新的「大學」觀念出發，現行的大學制度應該及早澈底修正，多多減除行政衙門的干涉，多多增加學術機關的自由與責任。例如現行的學位授予法，其中博士學位的規定最足以阻礙大學研究所的發展。這部分的法令公佈了十六年，至今不能實行，政府應該早日接受去年中央研究院評議會的建議，「博士候選人之平時研究工作及博士論文，均應由政府核准設立研究所五年以上並經特許收受博士候選人之大學或獨立學院自行審查考試。審查考試合格者，由該校院授予博士學位。」今日為了要提倡獨立的科學研究，為了要提高各大學研究所的尊嚴，為了要減少出洋鍍金的社會心理。都不可不修正學位授予法，讓國內有資格的大學自己担負授予博士學位的責任。

這是我的建議的大概。這裏面我認為最重要又最簡單易行而收效最大最速的，是用國家最大力量培植五個到十個大學的計劃。眼前的人才實在不夠分配到一百多個大學與學院去。（照去年夏天的統計，全國有二十八個國立大學，十八個國立學院，二十個私立大學，十三個省立學院，二十一個私立學院，，共計一百個。此外還有四十八個公私立專科學校。）試問中國第一流的物理學者，國內外合計，有多少人？中國專治西洋歷史有成績的，國內外合計有多少人？這都是大學必不可少的學科，而人才稀少如此。學術的發達，人才是第一要件。我們必須集中第一流的人才，替他們造成最適宜的工作條件，使他們可以自已做研究，使他們可以替全國訓練將來的師資與工作人員。有了這五個十個最高學府做學術研究的大本營，十年之後我相信中國必可以在現代學術上得着獨立的地位。

這不是我過分樂觀的話，世界學術史上有許多事實可以使我說這樣大膽的預言。

在我出世的那一年（一八九一），羅氏基金會決定捐出二千萬美金來創辦芝加哥大學。第一任校長哈勃爾（W. R. Harper）担任籌備的事，他週遊全國，選用當時空前的待遇（年俸七千五百元）選聘第一流人物做各院系的主任教授。美國沒有的，他到英國歐洲去挑。一年之後，人才齊備了，設備夠用了，開學之日，芝加哥大學就被公認為第一流大學。一個私家基金會能做到的事，一個堂堂的國家當然更容易做得到。

更數上去十多年，一八七六年，吉爾門校長（D. C. Gilman）創立霍鏗斯大學，專力提倡研究院的工作。那時候，美國的大學都只有大學本科的教育。耶魯大學的研究院成立于一八七一年，哈佛大學的研究院成立於一八七二年。吉爾們霍鏗斯大學才創立了專辦研究院的新式大學，打開了「大學是研究院」的新風氣。當時

霍撥斯大學的人才盛極一時，哲學家如杜威，如羅以斯(Royce)、經濟學家如伊黎（Ely），政治學家如威爾遜總統，都是霍撥斯大學研究院出來的博士。在醫學方面，當霍撥斯大學開辦時（一八七六），美國全國還沒有一個醫學院是有研究實驗室的設備的！吉爾門校長選聘了幾個有研究成績的青年醫學家，如倭斯勒(Osler)，韋爾渠(Welch)諸人，創立了第一個注重研究提倡實驗的醫學院，就奠定了美國新醫學的基礎。所以美國史家都承認了美國學術獨立的風氣是從吉爾門校長創立大學研究院開始的。一個私人能倡導的風氣，一個堂堂的國家當然更容易做得到。

所以我深信，用國家的大力來造成五個十個第一流大學一定可以在短期間內做到學術獨立的地位。我深信，只有這樣集中人才，集中設備，——只有這一個方法可以使我們這個國家走上學術獨立的路。（三十六，九，十八，第十六個九一八週年紀念日）

建議大學裏添設「時事研究」一科

原作者：嚴仁賡

原刊處：世紀評論二卷十二期

日本人丟在珍珠港的幾顆炸彈，驚醒美國人的一場甜夢。從那日起，孤立主義才算正式壽終正寢；從那日起，她方死心場地的跟着別國合作，提倡國際主義，大量展開外援。從美國大學裏，我們可以清清楚楚的看出美國人思想上這個大轉變。因為從一九四二年起，即有些學校添設國際和時事的課程。一處提倡，到處仿效，逐漸成為了一種風氣。這些課程，一部分是軍事當局之請為訓練軍官和譯員而設，所以特別注重外國語文和外國史地的講授；一部分則是純粹拿沒穿制服的學生（Civilian Students）作對象，而以時事研究為主體。前者我們不談，我們只談後者。各校增設時事研究的科目，有幾個目的：

一、為使學生注意時事，用心讀報，研討國際情勢，眼光可以放得大些遠些；

二、為使學生明瞭每天報紙上新聞的性質、背景，和內幕；

三、為使學生在校時就已對社會各項問題，知道怎樣應付，免得畢業之後茫無所知。

× × × ×

今年五六月間，我為學潮久懸不決而着急。我十分同情學生發動學潮的動機，我也最愛看學生寫的壁報文字和圖畫，從壁報上，可以看出學生的意見，可以發見他們的智慧，不過有些時候，言論太不負責任，態度太不夠誠摯，對於學校當局教授個人，很多誤會，不只批評，尚帶譏諷攻擊，甚且出言不遜，又令我百般的難過。當時我就想：既然社會人士都認為對付學潮不該高壓而應該疏導，然而疏導光仗着苦口婆心的勸又沒有用，我於是想，若是在大學裏面能夠添設時事研究一類的課程，倒許是防範學潮於未然，消弭學潮於已發的一個有力的工具，因為我當時看出，引用這個制度，在可以獲得上面所舉的三項功用之外，在當今局勢下，尚可得到附帶的幾種收穫：

一、它可成為學生的民主訓練場所。訓練學生在會場上勇於發言，鍛練學生表達意見的能力，不可再偷偷摸摸專門在感情上用事，應該造成一種坦白的，負責任的，以客觀態度分析時事發揮意見的習慣。

二、它可以溝通師生間的意見和融閡。這次學潮中，有時是學校當局和學生之間，有時是教授和學生之間，雙方常常處於對立的狀態。當局或教授勸告學生復課，學生每每予以白眼。這是學生對教授的不瞭解。在另一面，學校當局有的也太不能夠民主，於是彼此間隔閡日深。學潮既未能防範未然，發生之後又不能消弭於無形。如果平時能夠多見面多討論，誤會一定大可減少。

三、它既可供給學生以新聞的內幕和背景，於是學生對於時事的判斷，可以不完全訴之於感情。平素既已有客觀分析新聞的能力和習慣，遇事臨頭也能夠鎮靜應付，不至於盲目亂動，純以感情用事。即使到了時事迫在心頭上非動不可的時候，他們已知道運用理智，他們對國事世事又有充分的明瞭和認識，這種動，是有意義的動，是容易收到效果的動，是社會需要他們的動。即使動也可以適可而止，不至擴大而僵持不下，更不至像今年似的學校當局嚇得毛手毛腳，提前放假。

除去這三點與現時有關者外，我覺得「時事研究」的課程還有一項大用處，就是它更可以養成學生在課堂上討論或發問的習慣。到國外讀過書回來人都有同樣的感覺，都感覺比起外國的大學生來，我們的大學生是太不肯在班上向教員問問題。他們怕問問題，又怕問出太淺陋的問題來弄笑話（的確，中國學生在班上也真愛笑話別人）。寧可自己鑽牛角鑽上幾個鐘頭，把一個一句半句話便說得清楚的問題弄明白，他也不願在班上輕易的發問。外國學生那股傻勁我們的學生沒有。我在課堂上總是鼓勵學生發問，但是成效並不大。勢必等到考試前夕，才一堆一堆的夾着筆記本到家裏來，你一句我一句的東一句西一句的問。那情形簡直像是古殿窮儒，一兩小時下來，口乾喉啞，筋疲力盡。上下左右一學期的東西，希望我在一二小時之內全盤兜出，試問一個學期以內的功課，許多問題始終不通，前後怎能融貫透澈，我又不是神仙，一兩小時之內怎能完全講得明白。不愛問題的結果，學生在半年裏而能夠懂得的能夠學到的東西，真是少得可憐。

× × × ×

在一九四二年，我曾經非正式的參加過美國加州大學新設的一門「美國文化」。這一課的目的，不盡在介紹美國的各方面，它同時也牽聯到國際的有關問題的討論。這門功課，每週上課兩次，每學期兩學分。每次上課，由一位本校教授或有一位從他校聘來的教授或由一位從外面約來的專家主講。主講人是早約的，所以議題也是早定下的。在一、二星期之前，學生便先知道題目，接到教授留給他們應該參考的書籍期刊的單子，可以從容預備。開講時，聽者易瞭解，討論時，問題易於提出。等主講人講完，緊接着的是公開討論發問的時間，其情況熱烈異常。這門功課叫座能力之大，真可驚人，它和當時新開的專門討論兩性問題的一門功課居然不相上下。這門課，規定是三四年級選修的，選的人多，在一間頂大的教室裏上課。學生只要在一學期內沒有缺席，便可得及格分數。

最近讀紐約時報，又看到一篇文章，介紹美國達提茅斯大學（Dartmouth College）將於今年秋季開設新聞研究課程的一個大計劃，達校這個學科目，將被定名為「大事件」（Great Issues），規定為四年級各學院的必修課程。題材包括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範圍很廣，以報紙雜誌為主要的參考資料。為了幫助這門功課的進行，學校特別建立一所圖書館，為搜集並保管資料，陳列各種報紙期刊和雜誌。這門功課，規定每星期上課三次，一次是全班，在空曠草地上舉行，因為人數過多，教室容不下，其餘兩次在教室內分為二十組到二十四組舉行，每組定出一個主要論題。這兩次，一次是由一位主講人講演，另一次是全部時間用來討論發揮和分析，這次是由校長和主講人同來主持。研討的題目分為六大項：一為「何為大事件」，二為今日各國的政治體制，三為現代科學，以論原子能為主，四為世界和平的國際性，五為美國與世界和平，六為現代人類的估價。（詳見本年七月六日紐約時報星期專刊教育新聞欄）

× × × ×

我們不必一定仿照美國各校的方法去做。在我個人理想中，這門科目：應該定為三年級或四年級的必修科，每學期一學分，每星期上課一次，連續兩小時，第一小時由主講人講演，（下接廿一頁）

中宣部（35）利新第一三〇九號函批核准登記
內政部登記證京警滬字第一一一號
經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上海郵政管理局執照第一二二號